

全球对话

10.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与 Alain Caillé 谈社会学

Sari Hanafi

抗争与 社会运动

Ngai-Ling Sum
Michalis Lianos
Jorge Rojas Hernández
Gunhild Hansen-Rojas
Rima Majed

媒体与数位 资本主义

Marlen van den Ecker
Marisol Sandoval
Sebastian Sevignani
Mark Andrejevic
Jack Linchuan Qiu
Tanner Mirrlees
Mandy Tröger

理论观点

Francis Nyamnjoh

菲律宾 社会学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Filomin C. Gutierrez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COVID-19： 流行病与危机

Geoffrey Pleyers
Klaus Dörre
Sari Hanafi

议题开讲

- > 孟加拉的性别化都市空间
- > 劳工国际主义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 > 葡萄牙面临极右派的威胁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0卷 / 第2期 / 2020.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COVID-19的大爆发，正主导着世界许多国家的讨论和发展。在全球北方跟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所谓的热区(hotspots)或是鸿沟(gap)都显示了社会不平等议题的重要性。不仅是卫生保健，更包括疫情后续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都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某些国家中，经济危机构成了一段持续又严重的社会危机，而民主也受到限制性政策的威胁。在这期《全球对话》中，将考察一连串疫情对社会及社会学所带来的学术意义，而我们也邀请了不同国家的学者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在正文开始之前，三位作者分享了他们对于新冠肺炎影响层面的看法。

在「社会学对话」这部分中，Sari Hanafi采访了Alain Caillé，她是共生(convivialist)运动与宣言(manifesto)的联合创始人之一。Caillé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描述了共生主义(Convivialism)出现的开端，也说明共主义为何、如何作为一种「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将渴望于创造「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世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在前几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针对反民主倾向、新自由主义发展、市场驱动的经济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抗议。在许多地方，不论是新的社会运动或是新的抗议形式都已经慢慢出现，并挑战了现有的政治体制。我们第一部份的讨论，包含Ngai-Ling Sum、Michalis Lianos、Jorge Rojas Hernández、Gunhild Hansen-Rojas和Rima Majed等人的学术分享，将阐明目前在香港、法国、智利、黎巴嫩及伊拉克的情况。

第二部分的讨论将聚焦在媒体与传播如何受利益所驱使，形塑我们的社会。这些文章由Marlen van den Ecker和Sebastian Sevignani两位学者着笔，涵盖了传播的数位化及市场化中不同层面和其影响。从充当无偿劳动者的社交媒体用户、资本主义所有权中数据的功用、中国新数位劳工的积累，到媒体系统的重建，并展示这些过程如何与世界不同地区李的资本主义变迁有密切的相关。

在「理论观点」的部分，也充满了资讯与传播科技的主题。Francis Nyamnjoh深省于中非和西非对于人类镶嵌于本体论(ontology)中「人类的不完整与组成」一观点，详述其如何受到科技使用的影响。

而我们的部份则是关注于特定国家、区域的社会学。Filomin Gutierrez接下了拜访菲律宾同事的任务，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社会学议题，这包括：都市研究、应用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这些「议题开讲」(Open Section)中收录的文章都涉及了重要的社会学议题，像是：性别化的公共空间、劳工国际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以及对于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的反应。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17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i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阿拉伯：(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尔及利亚)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US Rokeya Akhter, Juwel Rana,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Muhaimin Chowdhury, Helal Uddin, Md. Eunus Ali, Mostafizur Rahman, Jhilik Saha, Maria Sardar, Tahmid Ul Islam.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h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哈萨克：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兰：Justyna Kościńska, Magdalena Kamela, Aleksandra Lubińska, Adam Müller, Jonathan Scovil,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gnieszka Szypulska, Iga Łazińska, Aleksandra Senn, Sara Herczyńska,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ziejewa, Weronika Peek.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ioara Paraschiv, Maria Stoicescu.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李宛儒, 林玟圻,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黃昱閔.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过去几年中，世界上许多国家见证了社会运动与公民示威活动的崛起。这些抗议与行动主要发生于街头，他们处理的议题包含反民主倾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市场导向经济的影响，以及社会不平等。此主题有四篇文章，其内容主要针对发生于香港、伊拉克、黎巴嫩、法国、智利等国家的这些社会运动与抗议，所具有的特定形式。



此主题提供人们菲律宾社会学的不同观点。菲律宾社会学学会的成员将在文章中分享他们的研究，其内容包含都市化与政府管理、LGBT运动、战争中的药物滥用、在贫困中做公共社会学，以及民答那峨岛地区的边缘化。



在这其杂志中，全球对话发起了以COVID-19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以讨论流行疾病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社会学之意义与影响。在此主题中，有三位社会学家和我们分享他们对于社会学近日以来面临的挑战与责任。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社会学对话

共生主义者宣言：新兴政治理念——Alain Caillé专访
Sari Hanafi, 黎巴嫩 5

> 抗争与社会运动

全球发展与地方运动
Johanna Grubner, 奥地利 8
2019-20香港抗争事件：新傅柯式的视野
Ngai-Ling Sum, 英国 9
实验政治：黄背心运动
Michalis Lianos, 法国 12
反对新自由主义不平等下的社会觉醒
Jorge Rojas Hernández、Gunhild Hansen-Rojas,
智利 15
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十月起义
Rima Majed, 黎巴嫩 18

> 数位资本主义

数位资本主义中的媒体与传播：批判观点
Marlen van den Ecker、Sebastian Seignani, 德国 20
连结传播与劳动：数位剥削
Marisol Sandoval, 英国, Sebastian Seignani, 德国 22
自动化与资本主义
Mark Andrejevic, 澳洲 25
时间性与中国数位劳动阶级的形成
Jack Linchuan Qiu, 香港 27
美中抗衡——数位科技与文化工业的战争
Tanner Mirrlees, 加拿大 29
自由市场会促进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吗？
Mandy Tröger, 德国 31

> 理论观点

Juju：资通技术的非洲启示
Francis Nyamnjoh, 南非 33

> 菲律宾社会学

在菲律宾「做社会学」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宾 36
菲律宾的都市研究：以社会学定锚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菲律宾 37
利用酷儿视角导引冲突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菲律宾 39
针对菲律宾毒品战争的不同调叙述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宾 41
使公共社会学在菲律宾发挥作用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菲律宾 43
在菲律宾社会学中「主流化」民答那峨岛
Mario Joyo Aguja, 菲律宾 45

> COVID-19：流行病与危机

流行病下的全球社会学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47
COVID-19：当前流行病的第一课
Klaus Dörre, 德国 49
后疫情世界的社会学
Sari Hanafi, 黎巴嫩 51

> 议题开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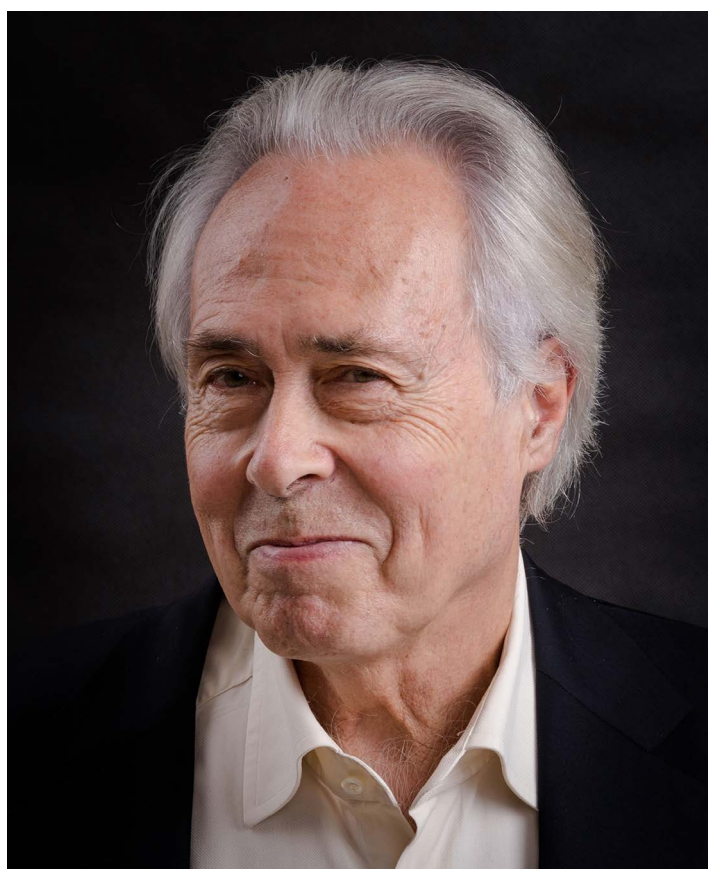
孟加拉的性别化都市空间
Lutfun Nahar Lata, 澳洲 53
劳工国际主义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Raquel Varela, 葡萄牙 55
葡萄牙面临极右派的威胁
Elísio Estanque, 葡萄牙 57

「年轻世代逐渐意识到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但他们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去质疑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也不给民主想像赋予新的生命，我们将无法去解决生态危机。」

Alain Caillé

> 共生主义者宣言： 新兴政治理念

——Alain Caillé专访



Alain Caillé 身为巴黎 Ov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以及MAUSS评论的编辑，以其对于当代经济与实用主义的犀利批判闻名，并且是共生主义者宣言(Convivialist Manifesto)的发起人。这篇访谈是在第二版的共生主义者宣言释出后，由ISA执行长Sari Hanafi 所进行。

Alain Caillé.来源: Alain Caillé.

SH:可以请你和读者简介一下共生主义者宣言的内容吗?

AC:在讨论这件事之前,我必须先提一下,第二份共生主义者宣言是由来自33个不同国家的将近300名知识份子共同签署,其中包含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社区活动家,以及艺术人士。正是这些人组成了「共生主义国际」的雏形。共生主义国际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没有办公室、没有组织架构,也没有资金,仅有的是善意,其将宣言扩展至这300名签署人之外、扩展到其他知识分子、活动家和艺术家——最重要的是,

它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大转变。数十年以来,我们都生活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霸权之下——就如Gramsci会说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难以想像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并服从于投机资本主义的规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带来了扭曲的不平等,其日复一日地将人们对于民主的理想掏空。除了那些试图反抗独裁者的国家,在多数地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民主的理想越来越失去信念。这个现象显然是个灾难,民主的现况就如同1930年代的欧洲一样,于全球范围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任何有关于

>>

批判思考的事物，都处于消失的危险中，而社会学更是首当其冲。

SH: 为何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强大呢？

AC: 新自由主义具有庞大的物质、经济、金融、军事、警察、媒体等资源作为基础，有时还有非法的资源支持。然而，作为另一股影响力，共生主义虽然较少被察觉，却是至今为止少数能够聚集如此大量人们的一种理念——这些聚集的人们所渴望的，并非是现在这个以金钱与利润逻辑为运行规则的世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即将面临难以弥补的气候与环境灾难。在较为富有的国家，年轻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浩劫的迫近，然而他们却并未意识到，如果不正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存在，我们便无法面对这些危险，更无法赋予民主活力。

理论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六个部分构成：1) 没有社会，只有个人。2) 贪婪是值得称许的。3) 社会越富有越好，因为所有人都会因涓滴效应而受益。4) 包含自我监控与投机性质的自由市场，是人与人之间唯一适用的协作模式。5) 这一切是没有上限的，越多越好。6) 这些是没有替代方案的。令人惊恐的是，即便这六个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实际理论基础，我们却不确定自己要用什么理由反对他们。

SH: 你会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AC: 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对抗新自由主义，是因为这些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伟大的政治理念，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它们任意之间的组合），已经不再有办法处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1) 这些意识形态，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上的：人类是以物质为首要需求的存在，且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由物质产生——以生产更多的物质为解决办法，辨识根据此前提所得出的结论。2) 只要在自然永远无法被耗尽，且我们并未面临长期停滞、经济增长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前述的「解方」便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了，情况并不是如此。3) 这些意识形态倾向将人们视为以物质需求为本的存在，却忽略同样重要的另一项冲突根源：对于受到认可的渴望。这些意识形态从未告诉我们，不管是在国家内或是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应该如何「相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共生主义(convivialism)一词可以被视为一个空白的能指(signifier)——就如Lévi-Strauss所说的mana一样——其象征着人们对于一个新政治理念的希望。在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中，那些渴望建立一个「后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人们都能获得认可，也都能将它们对于新世界的期待填置于这个词之中。

SH: 不过，你认为以「共生主义」作为这个新政治意识形态的专有名词，是一件合适的事吗？

AC: 「共生主义」这个词是适切的吗？新自由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将这些指称为「新自由主义」又是否合适呢？在英文和法文里面，conviviality 一词指的是和朋友聚会玩乐、共度美好时光的技艺，也因此其有着「美好」的内涵。这的确让我们的一些潜在支持者感到有点排斥，不过我们也很难想到可以找到更好的词汇，去描述「共同生活」的生活哲学。这个词汇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像Marcel Mauss说的——人们要怎么在不互相残杀的情况下对抗对方，又为何必须借此互相合作？然而，我们所探问的，真的是我们应该问的吗？在我们接触的学者中，有些人并没有签署这份宣言；他们认为现代的真正问题并不来自新自由主义霸权，而是来自于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我认为，只要读过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就会知道，后者其实正是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产物，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SH: 共生主义有什么基本原则？

AC: 共生主义并非只是一个空白的能指，也不只是希望的象征。我非常高兴有如此多元、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知识份子，愿意就共生主义的这五个基本价值达成共识。在这些人中，有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更有着多元的宗教信仰。这五个原则分别是共同的本性、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性、合理的个体化过程，以及创造性对立（以对立的方式合作而不互相残杀）。请恕我无法太详细的告诉你这五个原则的细节。总之，这五项原则划出了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论的空间，并限定了这个场域中，何种政治选择才是适切的。五个原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形塑出一个终极的理念：抵抗「过度(excessiveness)」以及「傲慢(hubris)」的必要性。人类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时间，能学习如何控制自身的傲慢倾向了。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可能正是社会学如今的首要任务。

>>

SH: 你的社会学是否呼吁要将社会学与道德哲学做出连结?

AC: 在其他事情上是这样没错。虽然这样有些怪异,但是我无法不以道德与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去阅读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等人的伟大社会学经典。虽然像霍布斯或是卢梭(他甚至曾说:「我们先不要考虑事实是什么」)等哲学家并不关心历史性和事实,但其他哲学家并非如此,就连人类学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试图探究过去的社会形式留下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便无法真的了解现在的世界。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于Marcel Mauss非常有兴趣,在他的讨论中,呈现了过去的社会如何组织、人们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透过现象学传统中所谓的「捐赠」,以相应于个人参与和礼物的比例取得认可。对于这样的场域,mana便是最精准的指称。若是缺乏道德哲学的视角阅读这些经典,我们将无从得知其精髓,更不会对其产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建立事实为追求的社会学,只得落入追求事实的无限循环(事实为何?其何以成为事实、又为何成为事实?),最终无法显示其重要性并枯竭。

SH: 你会考虑和道德企业家中的宗教权威进行讨论或合作吗?

AC: 我相信要避免生态、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和道德等灾难的唯一机会,就是让全球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和紧迫。而对于目前主要由金融和投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害(你应该已经注意到,我在谈论的并不是有关于资本主义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在更多的国家完成舆论的动员。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认为成功会有多大。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宗教权威的支持,我们就没有机会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份宣言中引用了很长一段《人类博爱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生活宣言(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的段落。这个宣言是在2019年2月4日时,由教皇方济各与阿兹哈尔大伊玛目(Grand Imam of Al-Azhar),以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名义共同签署。对我来说,我认为新教、佛教与犹太教等道德权威,没有理由不与这样的宣言做出联系。或许我们应该立刻尝试创立一个类似「世界人类共同大会(World Assembly of Common Humanity)」的东西,将认同于共生主义原则的群体代表,像是世界公民社会、哲学,所谓的「精确科学」,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不同的伦

理、精神和宗教潮流的群体,全部集合起来。在我看来,ISA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完成这件事情。

SH: 从全球南方的角度上而言,这份宣言有其有效性与可信度吗?有任何针对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吗?

AC: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答案会是肯定的,是因为有许多签署这份宣言的人便是来自你所说的全球南方,而且自从第一版宣言发布之后,便有许多来自全球南方的人参与于相关活动之中。答案是否定的,则是因为大部分的写作和起草,都是在北方完成。现阶段而言,南方挪用并丰富了共生主义的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份宣言正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除了英文、德文、义大利文和日文,也包含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预计将会把翻译后的版本带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希望能到印度、非洲等地区。阿拉伯文的版本也因为一些原因特别地重要。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想说的是,为了达成后新自由主义的共识,第二份宣言已经在生态、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奠下了基础。这已经很好了,但要整合有关于后殖民,性别,次等文化讨论的所有观点,我们需要做的还多着。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将有第三份、甚至更多版本的共生主义者宣言(或说是共生主义者宣言补给),毕竟它总是会需要一些修改与更新的。在往后的这些工作中,南方的贡献将是无可缺乏的。

SH: 你对于扩展共生主义感到乐观吗?

AC: 我觉得第二份共生主义者宣言为我们所急需的政治哲学奠下了基础。不过政治哲学的出现,并不会让政策自己出现。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找到「政治企业家」介入,让全球的人们,不管是一般雇员、收入不稳定的工人、遭受种族隔离的族群,还是小商人或企业家,都能够知道共生主义将带来的影响。如果在这些广大且多元的群体之中,有任何一个人开始感觉到、并和其他人说:「我认为自己是个共生主义者」,我们便有机会阻止可能发生的灾难。

SH: 感谢Alain,祝共生主义者宣言一切顺利。■

来信请寄至:

Alain Caillé <alaincaille90@gmail.com>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全球發展 与地方运动

Johanna Grubn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奥地利, 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 编辑助理

在 Covid-19爆发和颁布迁移与集会权限制之前,发生于全球各地的示威游行,反映出抗议活动正不断增加。这些抗议活动最主要是通过街头表达,以处理不同的议题与需求。这场研讨会包含了五个部分,正反映出这些社会运动与抗议发生的特定形式,而这五个地点分别是黎巴嫩、伊朗、法国、智利,和香港。

这场研讨会以Ngai-Ling Sum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场,他检视了2019年6月香港在街头发生的抗议事件。Sum使用新傅柯式(neo-Foucauldian)的观点诠释这场抗议并进行分析:在不自由政权的条件下,社会运动是如何急速地发生?借由不合理的警察暴力,政府对国家的控制日渐增强,抗争又如何可能?前线的暴徒在肯定式生命政治(affirmative biopolitics)下,如何保护生命免于(接近)死亡?

在2018年11月,法国各地出现了黄色背心的抗议活动,开启了社会运动中的新结构与新实践。Michalis Lianos的文章分析了这项具有自主性,却无党派形式的社会运动,其挑战了我们对于组织、架构(architecture)、集体政治行动(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反身性(reflexivity)的社会学理解。

在经过40年的新自由主义式政治与持续的抗议浪潮后,智利人的脑中绽放了新的解放意识,触发了2019年10月大规模、具创意性的抗议活动。Jorge Rojas Hernández 和Gunhild Hansen-Rojas描述了从新自由主义衍生出的国家社会危机。智利面对的独特历史机遇(opportunity)与社会中的抗议活动,引发出就全民公投建立新宪法的评估会议。

最后,我们以Rima Majed的研究来为这次的研讨会作一个结尾。Rima Majed探讨了2019年10月在伊朗及黎巴嫩发生的暴动,她以一种称为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在政治体系中引发的革命过程对这场暴动进行分析。为了寻会遗失的「我们」,社会行动者必须抵抗宗派主义下的分权模式(sectarian power-sharing),将社会及政治焦点放在社会经济正义的需求上。■

> 2019-20 香港抗争事件： 新傅柯式的视野

Ngai-Ling Sum,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国



香港2019，示威者以雨伞保护自身免于警察的催泪瓦斯攻击。摄影：Joe Lee。

2019年6月，引渡条例引起了香港的抗争事件。如果通过这项条例，将允许遣返香港的公民／游客进入中国大陆，根据当地的法律制度规定(或不根据规定)受到刑事诉讼。这激起了当地人对于香港将失去一国两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恐惧。当香港1997年作为特别行政区(SAR)返回中国大陆时，「高度自治」这点受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及中国1990年《基本法》的保障。在这个框架下，香港拥有行政权与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中央政府根据当地选举或协商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利。

自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主权下对「一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香港的人们越来越担心失去自治权。例如，从2003年的第23条反颠覆法案(Article 23 anti-subversion bill)到2019年

的中国国歌条例等亲中法律的实行。而这些措施正伴随着香港民主要素的消减，例如在2015年中国拒绝了香港直选行政首长，以及在2017年取消六名民主派立委的任职资格。2019年对引渡条例的紧密追踪，更加凸显了这种一国政治下对权利的侵害。香港特区的政府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甚至跳过了委员会审议阶段的常规立法审查，直接将该法案提交亲中的立法机关批准。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下，6月9日时有一百万人参加了和平游行，6月16日甚至达到了200万人。由于官方迟迟不给出回应，加上港警的暴力行为，使抗争活动持续不断。抗争者提出五大诉求：撤回引渡条例；停止以「暴徒」形容示威者；赦免所有遭逮捕的抗争者、独立调查警察的暴力行为、落实香港行政首长及立法会的普选权。最终，引渡条例在2019年10月4日撤回。然而，由于警察暴力的反复发生，以及香港特首

>>

拒绝接纳抗争者其他四点诉求(见表一)，原初的抵抗事件逐渐演变成社会运动。

在将这起抗争事件分析为社会运动时，本文将采用新傅柯式(neo-Foucauldian)的观点，关注主权生命政治下的生命／死亡。傅柯认为，统治者会自认有权力去统理一块领土，并参与生命／死亡的生命政治去维持本身的安全。在现代社会中，主权(sovereignty)的程度各不相同，在不自由的独裁政权背景中，主权会比民主国家更加明显。随着香港一国政治的开始，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大陆的一党制政体一起参与了共同主权(co-sovereign)的规则，维护香港的稳定／安全。香港的抗争者生存在这共同管理的独裁政权边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们抵抗的生命政治，也因此涉及于将自身生命武器化、投注于死亡(或死亡边缘)的前线暴动者；以及确保了暴动者的生命安全，使其免于(接近)死亡的支援者。

> 暴动的生命政治：武器化下(接近)死亡的生命

面对中国大陆加速进行的一国政治，以及2019年随之触发的抗争事件，警察及法律在生命政治的不同环节中扮演了统治者的角色：一、削弱了上街抗争的生活模式；二、以逮捕、起诉、诉讼施加恐惧；三、透过不成比例的暴力造成人身伤害。在中国中央政府以「几乎是恐怖份子」谴责抗争者，而香港特首又不回应于五大诉求(见表一)之际，抗争活动的手段已从和平转为凶残(见表二)。防暴警察在特首的支持之下，已经反应出更多凶残的制暴手段：催泪瓦斯、任意或强行逮捕、虐殴、化学水炮车，甚至是枪击。他们为抗争者贴上了「蟑螂」等标籤，表示为了安全他们应该被消灭。这已经恶化成「暴力引起更多暴力」的局势，抗争者已经开始感受到个人或公众的恐惧及无助。

表一：香港抗议者的五大诉求，2019

撤回《逃犯条例》
停止以「暴徒」定义示威者
释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
实行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表二：抗议的和平与武力形式

抗议的性质	举例
和平	示威、人链、在公共场所唱歌/集会、制作海报/法令、列依墙/隧道、国际宣传等。
武力	喷雾罐、雷射火把、街头战斗、汽油弹、路障、私有与公有财产破坏、投掷砖块、纵火焚烧中国的商业网点、围攻大学等等。

前线的抗争者为了回应不成比例的警察暴力，以及他们对自己和香港未来的恐惧，将自己的生命武器化进行抵抗。他们的抗争为「香港人」的认同提供养分，促使其成长。一些暴动者准备牺牲他们的生命，捍卫／拯救香港里那些始于「两制」的自主生命。在与警察的战区式战斗中，有些人甚至将遗嘱(和非自杀声明)放在了他们的背包里。这些个人反映出了「为香港社会献出生命」、「用我的鲜血捍卫香港」以及「用死亡换取自由」等精神。在香港暴动的生命政治中，这些将自己的生命武器化的生命政治，强烈地形塑出希望／恐惧、震惊、愤怒、眼泪、鲜血和(接近)死亡的方式。抵抗行为则涉及于生命政治中的心理创伤、自我牺牲、身体受伤的恐惧、逮捕、拘留，起诉、监禁、失踪，和自杀。

> 肯定式的生命政治：保护生命免于(接近)死亡

抗争者的暴动的生命政治正采取积极的行动来保护生命。在上次2014年雨伞革命的主要人物，得知社运领导人可能会遭到起诉和监禁的经验下，使当前的社会运动在没有正式领导人的情况下运作。运动中采取无领导者的策略，以及「像水一样」互助的扩散策略，通过像Telegram和Airdrop之类的网路应用程序来分享情报，与彼此协调行动与抉择来促进这项策略。

这场运动由云端集资，并得到一些跨职业、跨世代、跨性别及跨种族阵线的互助团体帮助。这些支援者齐聚一堂，保护暴动者的生命免于(接近)死亡。一个例子是由「银发」的老年人团体发起的「保护儿童」运动，以保持警惕保护第一线的青少年；有些人则是选择站在防暴警察和抗争阵线之间；而其他则举着标语牌，上面



2019年于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摄影：Virginia Pak。

写着「不要对我们的孩子开枪」。生命政治的供应链也支援了这些保护生命的行动，像是：提供捐款、食物、水、口罩（用于保护身份或个人安全）、雨伞、资料保护、免费的交通，医疗支援、社会照护、法律咨询，以及能容纳第一线人员的开放式房屋。

其他积极的生命政治形式还包括：一、在香港海港的两岸形成一条三十英里的人链，象征对自由的渴望；二、发起公开哀悼死者的活动，以治愈公众受伤的心灵，同时重新许下承诺；三、在五天内完成并录制新歌，例如《愿荣光归香港》，以鼓舞士气并团结起来；四、组织新的工会和选举支柱，以巩固街头抗争的力量。而我们可以（跨）本地和（跨）国中，找到类似激励人心、充满正能量的做法。香港拥护者与散居海外的人士／支持者携手合作，以地方社区、国家立法机关、全球媒体和国际组织为目标，争取在这场斗争中「与香港站在一起」，进行国际倡议与人民外交。

> 结尾短评

本文对香港2019-20年的抗争采取了新傅柯式的研究取径。考虑到这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大陆一党政体，共同主权统治中的不自由独裁体系条件下发生，主权生命政治的观点对于理解这场抗争而言非常重要。这也突显了2019年的紧要局势，当时在香港全面实行的一国政治，正伴随着一些支持一国两制的公民拒绝放弃香港的「高度自治」。而这种对一国两制的斗争是体现于，主权国家透过不成比例的警察暴力，越来越坚信能如此控制香港。在这场香港政治移转的斗争中，抗争者中暴动的生命／死亡的生命政治与支援者的积极生命政治行为并存。■

来信请寄至：

Ngai-Ling Sum n.sum@lancaster.ac.uk

致谢

我想要特别感谢Brigitte Aulenbacher, Bob Jessop, Virginia Pak, Joe Lee 以及Lancaster Stands 跟他的香港团队协助撰写本文及提供照片。

> 实验政治： 黄背心运动¹

Michalis Lianos, University of Rouen, 法国



2019年巴黎，大量警察出现于示威游行中。摄影：Michalis Lianos。

黄背心运动在毫无预警地情况下发生。因此，法国的社会大众完全不知道这场社会运动的潜力。众所皆知，既有的政治机构与大众传播媒体严厉抨击该运动。然而，这并不意外，因为法国国民多视白人下层阶级为遭隔离的少数族裔与中产阶级间的缓冲带。更令人惊讶的是出现自发且无党派运动，并打破后工业社会中既定的政治分层架构。这当然与新政党（共和前进党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在法国赢下

总统与国民议会的选举，以及出现从未当选过公职的新任总统这种罕见结局有关。对进步改革的期许很高，但随之而来的失望也很高。

该运动首先在2018年11月17日浮现在全国公共领域中。两周后，该运动成为全球头条新闻。在这段时间中，一个惊人的转变正在发酵。黄背心运动从一开始与燃油税挂钩的争议，迅速地朝向质疑当代社会整体政治体制架构发展。他们现在的诉求是建立全民公投，让人民

>>



2019年巴黎，一位示威者描述自身的处境。
摄影：Michalis Lianos。

可以对于各领域重要议题的治理有完全的控制权。同时，他们声称自己是受到屈辱的「人民」，受到菁英阶级的忽视，好像理应就在近乎贫困的生活里漠不作声，即便他们代表了法国社会的核心。他们多运用非政治或和平主义者的自我认同来特别增强社会合法性，因为当中的多数人未曾参加过示威游行活动，并对政党漠不关心或敌视。因此，当他们受到武装镇压时感到震惊与被冒犯，他们认为自己是初次行使抗议权的守法公民。

除了做为一个抗争运动的重要性之外，黄背心运动还为社会运动的结构与实践开辟一个新阶段。该运动有许多具原创性的部份挑战一系列有关集体政治行动的性质、组织与成功的

假设。我将简要介绍五个层面，来说明这些创新的社会学意义：

1. 拒绝任何与政党或社会运动组织的联结

这场运动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自发性。黄背心运动并不是因为特定的政治取径或理论而聚集在一起，也没有共享任何宽松意义下的政治观点。他们甚至连松散的政治观点都没有。然而，他们却本能地认为，不应该信任任何政治结构。任何持有或追求权力的人在他们眼中都是腐败，或仅仅是对自身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关心「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并不代表黄背心运动走向「民粹主义」。相反地，他们不仅不允许独裁主义，更不允许黄背心运动内部拥有阶层制度。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组成了由个体紧密构成的社群，并自称是一个「家庭」；不管自己同不同意，这群人谨慎小心的捍卫着能对于各个议题做出决定的权利。总而言之，他们自发性跳脱任何既定的社会政治框架或平台。

2. 意识形态多元化

众所周知，社会运动倾向意识型态的同质化。尽管在社会运动中时常发展出紧张与敌对关系，但这种紧张关系围绕在控制一个意识型态的统一框架、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几乎都是理所当然。黄背心运动再次成为同质性规律的例外。他们不仅没有有限缩特定的政治意识型态，同时还设法建立多元化的基础。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坚决不让政党政治干预此社会运动，也因为他们在特定议题上意见分歧时能够自发地接受彼此地共处。他们的解释是具备经验性基础的。尽管他们「一团糟」，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客观的相同之处与改变现状的意愿。他们对现况的解释可能不同，但总是与一种制度有关，即有权势者没有充分尊重人民，来确保人民能过体面的生活。

3. 神经元结构与自治

这场社会运动是透过在网路或实体空间中部份重叠群体所自发性组织而成。每个参与者都通过一个或多个线上小组或或空间参与讨论、辩论、集会与抗议活动。这种神经元结构的发展完全渗透法国（包括偏远的殖民领土），这是黄背心运动的重要特色。网路所提供有关个

>>

人自治的意识，充份反映在他们选择全国各地做为社群聚集地。这两个情况的概念性假设为自治交会点会确保只有这样的社会网络才能拥有权力，没有管理顶层，也没有执行底层。

4. 直接民主

自然而然，这些特征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基础，在此政治形态中，持续且平等的参与是前提，而非乌托邦式的目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由受过良好教育、低下阶层、初次抗议者等群体组成的社会运动，准确地指出了代表性参与与决策系统的危险性与过时。他们使用两种强而有力的方法来表达这一诉求。首先，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层次上代表黄背心运动。尽管所有政治机构强力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选出常任代表，但他们只有逐案选出发言人。没有任何人能够以“黄背心运动”的名义发言，任何企图这样做的人都等于背叛这场运动。第二，他们认为应该要改变当代社会的整个政治结构。他们要求在每个领域引入由公民发起的公民投票。由公民做出决策，而“政治精英”执行他们的决策。

5. 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

今天是2020年2月23日，黄色背心运动的第67周。毫无疑问地，这是近期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政治抗议活动。黄背心运动从来没有追求特定的乌托邦，也没有一个预定要实施的政治计划。相反地，他们在多元化优先议题与思想上保持互相开放的态度。这使他们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体反身性。他们专注在推动全面性的政治改革，而不是在既有的体系中争取权力。因为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介意结果的不确定性。正如我访谈他们的时候常说的：「我们必须继续，我们将看到成果」。

尽管数量不多，但法国各地仍在进行黄背心运动的集会、游行与抗议活动。每个人都好奇，这场社会运动持久的影响会是什么。无论如何，能够得到一个结论。黄背心运动已经证明，集体政治是可能的。作为大规模直接民主的象征，他们在个人经验、社区与政治形态中建立新的连结。■

1. 本篇文章自黄背心运动开始，建立在严谨基础的经验研究。其他分析请见[這裡](#)、[這裡](#)或 [這裡](#)。

来信请寄至：

Michalis Lianos <michalis.lianos@univ-rouen.fr>

> 反对新自由主义 不平等下的 社会觉醒

Jorge Rojas Hernández, 矿业与农业水质研究中心 (CRHIAM), 智利 · Gunhild Hansen-Rojas,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智利



敲打锅子是智利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摄影：Diego Correa/flickr.com.保留部分权利。

智利当前的社会抗争事件(estallido social)都创意地伴随着涂鸦、壁划、音乐、诗歌、歌曲、会议和集体辩论，智利人在历史上累积的不满情绪，也因此以一种新的美学形式表达。人们用一些口号谴责数十年以来的不满、社会弊病、歧视和社会不公等现象，例如：「智利觉醒了!」、「...直到人类的尊严成为每一天的日常!」、「智利将埋葬新自由主

>>

义!」、「我已经不再害怕!」、「不要再这样对待我们!」、「留下个人退休金!」、「市场不会保护社会权!」、「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新宪法!」、「没有我们女性,就不会有政治协议!」、「我们需要新的民主!」、「全民免费教育!」、「自由的公共水权!」、「我最担心的是一切都不会改变!」、「常态就是问题!」、「争取和平生活的权利!」

> 痛苦的觉醒

智利在2019年10月18日变了。人民压抑在内心的愤怒,以一种既巨大又富有创意的方式解放。而现在,经过四个月持续不断的抗争活动,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可逆的新共和式精神。40年后,智利人开始意识到盛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t)和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不平等,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基础服务、退休金、教育、医疗照护、自然资源。然而,政府却以警察暴力作为回应。有400多人因为枪击失去了视力、女性遭到了强暴、发生私刑、上千人遭到随意逮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已经确认智利的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并呼吁智利政府积极地采取行动。

智利社会的觉醒并不是自发的,而是长年累积的负面经验及不满社会的复杂过程下的结果。40年后,新自由主义体系已经耗竭并迎来了最大的危机,暴露出该国难以恢复的不可逆伤害。借由抗争活动与氾滥的新资讯,一股新的解放意识正在智利人的心中渐渐形成。

> 社会及生态不平等、社会运动

智利在社会和结构上不平等增加的速度比原初对市场的承诺还要快:低薪资、不合理的退休金、医疗和教育体制私有化以及随后上涨的费用、工作不稳定、昂贵且私有化的基础服务、惊人的生活成本,以及财富的极端集中。此外,年轻人难以进入劳动市场、针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原住民族的权利依然没有受到认可。公众参与过低、环境问题、应付气候变迁的脆弱性,以及水资源和一般资源的匮乏,也导致基础服务的提供出现其他问题。

这些私有化及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的政策必然会使意义丧失,同时造成未来的不确定性,抗争活动跟出现新的社会运动就是一个结果:2006年发生了「企鹅抗议运动」(penguin protests)—高中生为了要求政府改善国民教育体系所发起的运动。接着在2011年发起了一个具影响力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要求免费的大学教育。这两个运动在大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2018年出现了反对私有化退休金体制的「No+APF」运动。族群运动中,特别是马普切人(Mapuche)社区的代表,要求他们要受到宪法的保障、土地归还,并作为少数民族得到特定的自治权。同时,也有新型的环境和抗争运动,反对导致生态系统和栖息地崩坏的大型开发案。位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Hydro-Aysen水力发电厂也成为了这一运动最重要的象征。此外,民众反对环境政策的抗议活动,也出现在昆特罗(Quintero)、普琼卡维(Puchuncaví)和科罗内尔(Coronel)市所谓的废弃区域(zonas de sacrificio)。由于这些地方受到了高密度工业的严重污染,导致该地区的高发病率。2019年也是女性运动中支持性别平等、反对性虐待的一年。从这些迹象中可以发现,智利社会已逐渐动摇,意识到了这种光鲜亮丽背后的阴暗面,并积极地从基层开始组织。

> 社会改革及社会契约/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智利需要朝向福利国家的面相进行强力的社会改革,以弥补现有的不足并满足抗争者的诉求。一个包含各种社会组织的联合组织—统一社会组织(Mesa de Unidad Social)要求在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下达成一项社会契约,其口号是「没有社会正义就不会有和平」。2019年12月22日,在智利大部分的城市里,成功地完成了对市民紧急调查的问卷研究,其中有超过250万智利人积极地参与了问卷调查,而有了以下的结果:91.3%的人希望制定新宪法; 89.9%的人愿意参与2020年4月的全民公投;绝大多数人赞成能够民主选举的立宪议会。公民投票还显示了三项重要的议题顺位:改善退休金、改善医疗照护,以及保证能够改善国民教育制度。因此,社会协定将是解决当前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重要贡献。

这些社会诉求早已是二十世纪民主的一部分，但部分却被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所废除。正如当前全球发展和讨论所呈现的那样，福利国家的这些历史成就在二十一世纪必定要再次被提及，并重新纳入现有的政策之中，以保障人民的生活品质，抵抗右翼的民粹主义（populism）并确保国家的发展。

> 国家和政党的合法性危机

社会危机揭露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国家缺陷。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最小政府（minimal state），建立私有化和个人化的社会。如今，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学说毁灭性的后果。智利的保守派政府一时不知所措，以暴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压制作出反应，而没有明确区分出广泛、民主的和平抗争活动，与少数独立团体的抢劫、纵火和暴力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的智库于2019年12月发表了以下智利人对政府机构的信心调查结果：只有5%信任政府，3%信任议会，2%信任政党和8%信任司法机构。绝大多数人拒绝以暴力作为抗议手段，同样也拒绝警察暴力。67%的人要求制定新宪法，56%的人认为制定新宪法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手段，87%的人支持能够促进社会和政治对话，达成共识的领导人。在调查中，有64%的人认为退休金是政府需要赶紧处理的问题，另外还有46%认为是健康，38%认为是教育。这份调查强调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 为了新宪法和全新的民主

2019年11月15日，强烈而持续不断的社会抗议活动，致使政府和反对派于2020年10月2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达成共识，制定了新的宪法。拟定新宪法的代表人将于2021年4月11日推选，并且必须满足三个重要标准：满足男女比例的平衡、必须是与政党无政治关系的人，需要原住民族的代表。

有了这种公民投票以及相关的未来策略，智利将拥有独特的历史机会，在所有社会行动者的参与下和平、民主地解决现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保守部门拒绝支持这个计划仍是一个潜在的阻碍，他们的目的是为阻止新宪法、现代化的制度、退休金、卫生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而能够维持现有的权力和市场结构。希望公民运动的诉求最终能够体现于和平、民主的进程，以及社会各部门广泛参与下的成功公民投票之中。■

来信请寄至：

Jorge Rojas Hernández <jrojas@udec.cl>
Gunhild Hansen-Rojas <hansen-rojas@udec.cl>

> 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十月起义

Rima Majed,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ISA武力与冲突解决研究委员会(RC01), 国族主义、原住民与种族(RC05), 政治社会学(RC18), 女性、性别与社会(RC32), 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 社会运动, 集体行动与社会变迁(RC48)



2019年10月伊拉克起义期间贝鲁特的示威活动。
来源: 维基百科创用CC。

2019年10月世人见证伊拉克与黎巴嫩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员行动。抗议行动就如野火一般在两国迅速蔓延,几天内就吸引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其主要诉求为失业、税收不公、普遍腐败、欠缺基础服务(如水电)与政府治理不善等问题。尽管上街表达这些诉求并非第一次,但2019年10月抗议行动的规模与以往任何社会运动相比都不太相同。在黎巴嫩,就跟在伊拉克一样,这场起义迅速被称为「革命」,这显现出与先前动员(如两国在2011年和2015年的抗议活动)浪潮的鲜明差异。

尽管这场起义跟传统社会运动文献中对革命的定义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推翻整个政权,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从革命过程来考量,而非革命成功或失败。实际上,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十月起义是在两国长达数十年周期性动员的背景下所爆发的,其中,2015年形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基于社会经济需求而出现的反政府的动员,不同于过度强调认同政治的视角。此外,这些革命性的「社会爆炸」显然是在苏丹与阿尔及利亚2018年底发

生第二次阿拉伯起义浪潮的背景下而爆发的,因为两国皆成功推翻独裁统治者。

但是,将伊拉克与黎巴嫩的案例跟2011年以来阿拉伯其他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其不同之处在于这两国的抗议者试图推翻政治体系。尽管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都是在具有专制政权或君主专制的国家发生的,但黎巴嫩与伊拉克是在协和式民主体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爆发起义的,这个体制是基于身分(宗派和族群)的权力共享,因此,没有一个明确的“头”要去推翻。加上新自由主义、宗派专制主义(称为muhasasa)以及过往内战与暴力的遗产,使这些起义的道路更加难以辨别。

> 宗派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 会不会搞错重点了?

自2019年10月,黎巴嫩与伊拉克的主要广场到处都有示威者在挥舞国旗与唱国歌,两国的示威者时常采取这一行为,来表达拒绝宗教与种族

>>

分裂，尽管存在多样性，却强调「存在」与「民族团结」。但是，民族主义与宗派主义是否一定是相反的？

数十年来的文献表明宗派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现象并不一定是相反的，因为民族主义经常带有宗派主义的内涵。例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常常与逊尼派色彩联系在一起，而黎巴嫩民族主义历史上一直与基督教内涵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社会层面上，运用民族主义作为拒绝宗派主义的标志仍非常普遍。伊拉克与黎巴嫩的起义显然渴望透过建立一个「想像的国家」做为解决宗派主义问题的解方。

伊拉克抗争运动自10月初开始，当时有组织呼吁以Nazel Akhod Haqqi(我正在行使我的权利)的名义动员。伊拉克广场上的主要口号为「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来呼应2011年的著名颂歌「我们要一个家园」。当抗议者提出建立「家园」、「国家」或「民族」的要求时，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为国民服务的国家，并提供超越宗派或种族分裂的归属感。

在黎巴嫩，同样有着重新想像「民族国家」的类似过程。尽管起意与政府决定征收新税(包括对WhatsApp征收的税)有关，但广场上很快就充满国旗，国歌也不断被重复播放。虽然主要口号包含著名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权」，但增加一个更量身打造的口号：「全部就是全部(All Means All)」，其拒绝宗派权力分享制度并谴责所有政治领袖，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宗派。就跟伊拉克一样，拒绝宗派主义是透过摆脱所有宗派领袖，并建立一个保护公民并平等公正对待他们的民族国家。

尽管许多人认为两国的腐败与不平等程度是宗派制度的后果，但这种观点忽视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造成起义的重要角色。时至今日，伊拉克与黎巴嫩的社会运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同时对抗宗派／新自由主义政权制度：其将重点放在社会经济正义与福利国家的诉求上，同时拒绝宗派分赃权力的制度。

> 新自由主义与不满：寻找迷失的「我们」

新自由主义盛行在战后的黎巴嫩(1990年代后)与遭入侵后的伊拉克(2003年后)。国家衰退与宗派顾客主义的兴起，加上关注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不仅影响国家与整个社会，也反映在行动主义与异议的性质上。

尽管有许多激进主义者已经在社会运动圈中活跃数十年，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最大且最有效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在个人身上。例如黎巴嫩的Beirut Madinati(贝鲁特，我的城市)是2015年黎巴嫩动员后的其中一个主要选举活动。与其强调将城市重新视为所有人共享的空间并忽视新自由主义下个人主义逻辑中的「我们」，应该要更强调城市与个人的关系。相同地，在2019年金融崩溃后，黎巴嫩起义的激进主义者在银行窗户上喷上涂鸦，表明「还我钱」而非「还给我们我们的钱」。尽管人们对银行的集体愤怒很明显，但形塑激进主义的政治文化仍是它所反抗的体制下的产物。

许多社会运动还强调法律与基本权利的方针，然而，这似乎与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现况脱节。因为两国的法律与司法体系都非常薄弱且腐败，人民对此几乎都不信任。因此，「权利」与「义务」的用词在这两国人民的政治想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然而，一些著名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将个人“权利”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几个案例包含先前提到的伊拉克「我正动员起来争取我的权利」，或黎巴嫩起义中非常活跃的政治团体“LiHaqqi”(为了我的权利)这种强调个人权利亦表明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幻想与渴望，期许国家机构能够平等的维护个人权利，而非腐败与宗派侍从主义。

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宗派—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后果是，缺乏代表政治替代方案的组织或联盟，能够当作起义转往新政治体系的过度。随着近来武汉肺炎在两国的扩散，迷失「我们」运动的出现与组织显然无法保护社会免受经济灾难，亦不能免除疫情大流行的危害。■

来信请寄至：
Rima Majed <rm138@aub.edu.lb>

> 数位资本主义中的 媒体与传播： 批判观点

Marlen van den Ecker,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德国、Sebastian Seignani,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以及 University of Paderborn, 德国



在数位资本主义中使用者经常成为无薪劳工。摄影：Alex Kotliarskyi/unsplash.com。

当代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并在通常被称为「数位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社会条件下进行传播。与「后工业」(postindustrial)、「资讯」(informational)，甚至是「全球知识社会」(global 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不同，「数位资本主义」呈现的是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经济剥削、文化性异化(cultural alienation)、和政治统治等基础社会关系上，表现出的重要连续性。数位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然数位资本主义一方面促进创意性知识阶层形成，并加速了消费主义

(consumerism)；但在世界的另一边，数百万人以拆解所需的原料或在有害的情况下组装组件来谋生。但是在多样性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使用者成为社交媒体平台或数位媒体制造商下被剥削的新阶级。监视技术正在威胁公民的人身权利。以资本驱动的利益结构，阻碍了自我组织媒体(self-organised media)的草根(grassroots)民主和其颠覆性的潜能。

随着数位媒体技术的实用性与日俱增，批判性媒体(critical media)和传播社会学(communication

>>

sociology)为我们对整体社会变迁的理解提供了见解,甚至为我们的学科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这两者解释了新的一波理性化(rationalisation)、资格(或取消资格),以及对劳动活动和价值链(value chains)的重组,对劳动和工业社会学做出了贡献。而当调查大数据、演算法(algorithms)、目标式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和数位平台作为新市场的关键作用时,这两者也与经济社会学和消费社会学(consumer sociology)彼此互动。此外,这两者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合作,逐渐适应了数位文化产业和当前公共领域的转变。而当他们涉及于像是「产消合一者」(prosuming),这种在数位现象的传播与劳动之间的模糊关系时,就会刺激社会理论的活化。

本次研讨会文章中的批判性见解希望能抛砖引玉,引领出其他学者对这些问题追本溯源。

由于现有的批判式社会研究似乎对媒体和传播没什么兴趣;另一方面,传播研究又经常会在数位研究中撇除剥削的问题。因此,Marisol Sandoval和Sebastian Seignani通过「数位剥削」(digital exploitation)的思维,将传播与劳动联系在一起。而时常忽略的是,当代全球媒体文化的产生依赖于传播与合作——而这通常是由科技巨头(Big Tech)控制和管理。我们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在公司可以取得人们的数据轨迹的情况下,同时也成为了这些公司的无偿数位劳动者。

澳大利亚学者Mark Andrejevic也运用了以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商业模型逻辑。他的文章探讨了自动化产生数据及其增加趋势,还有资本主义所有权和资本积累在之中发挥的作用。Andrejevic并没有探究是否应该使用自动系统,反而质疑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是如何设计成形。

于香港研究的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探究了形成新的数位劳动阶级的可能性。中国的例子显示,政府的监控技术在空间性(spatiality)上,确实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然而邱林川指出,当关注于不同的时间(temporal)模式时,数位劳工阶级在采取集体破坏性行动,例如放慢工作、刻意破坏、罢工时,可以发挥其颠覆性的潜力。而阶级斗争便是数位劳动者寻求时间主导权的新方法。

即使通常以这种方式形成研究框架,我们的加拿大同事Tanner Mirrlees也怀疑中国是否是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他强调美国不仅拥有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其数位技术和文化产业在目前的规模、范围,和利润方面也都远远超过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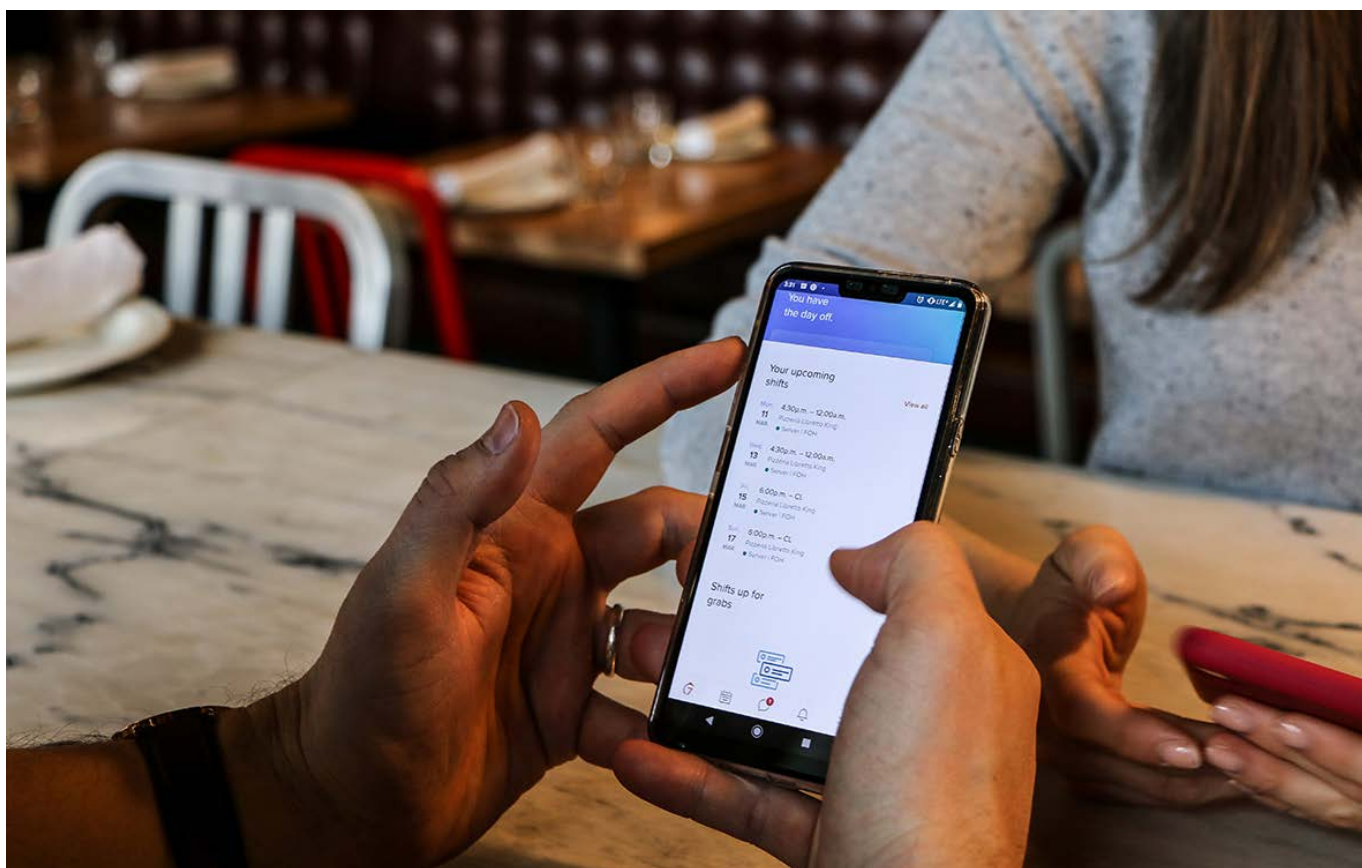
我们亲爱的同事Mandy Tröger提供的最后一篇文章,将教导我们一堂历史课,有关德国重新统一后媒体制度中,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转变的历史。1990年的春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里立场较自由、民主的东德新闻圈所采取的无数新举,很快地就被少数为自身利益建构市场形式的西德政治、经济团体所压垮。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历史中具民主潜力的媒体基础建设,如何屡屡受到私人经济利益所破坏。■

来信请寄至:

Marlen van den Ecker <marlen.van.den.ecker@uni-jena.de>
Sebastian Seignani <sebastian.seignani@uni-jena.de>

> 连结传播与劳动： 数位剥削

Marisol Sandoval,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国、Sebastian Sevignani, Paderbor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Jena, 德国



在分析媒体与传播时，劳动的角色经常被过度强调。
摄影：7shifts/unsplash.com. 创用CC。

批判性媒体(critical media)和传播社会学(communication sociology)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两难困境：对受到马克思式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启发的批判社会理论来说，生产活动是理解社会转型推动力的重要关键，而传播和媒体等议题往往不被重视。另一方面，批判性传播研究分析了意识形态和媒体效应，但往往忽视了劳动议题。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名学说区分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和沟通行动(communative action)为社会生活(social life)中两个独立领域，似乎不仅困扰着主流媒体社会学(media

>>

sociology)和传播研究,也限制了批判性的传统。在数位化的时代里,这大大地侷限了我们对媒体和传播的理解。因此,我们主张采用批判性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上的综合研究取径,提出三种传播和劳动在实践和理论上相交织的情况。

> 媒体界的工作环境

连结传播和劳动的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方法是,认真思考全球规模内支撑当代媒体文化的工作条件。在批评者很正确地描绘出工作/劳动是媒体和传播研究的盲点之后,过去十年中的许多研究已经调查了包括新闻、设计、时尚流行、媒体和艺术在内的一系列媒体及文化部门的工作环境。这些研究显示,围绕在这些行业的精英领导体制(meritocracy)、年轻、开放、创造力、自主权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背后,是种族、阶级、性别、危险合约、无偿劳动的不平等结构,还有超时工作、工作压力、焦虑、自责、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

纵观全球文化生产的供应链,可以发现媒体文化与物质生产结构上第二个更为深层的连结面。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在世界各地的制造工厂中,组装电脑和电子产品,我们将无法想像现代的媒体文化。对电子制造业的有力研究显示,现代数位文化在结构上得以维持,是有赖于延续类似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作条件。除了一些丑闻,例如苹果公司(Apple)的供应商富士康(Foxconn),在2010年发生的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之外;这些工人的现实日常很大程度上仍隐藏在,强调轻巧和创新的现代产品、广告活动的光鲜外表之后;例如,将记者、设计师和艺术家看作工人,同时又将电子制造业定义为工业和传播劳动。这表明了媒体、艺术和传播绝不仅仅是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al)的现象,他们已深深融入资本主义式经济和剥削结构中。

> 以传播进行生产

第二种情况里我们可以主张说,人们为了生产必须进行沟通及合作。每个生产都在沟通和中介的生产关系中。在这部分,媒体社会学及传播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互动,针对劳动是如何被组织和控制进行研究。(新)媒体和通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智慧型手机、数位平台,创

建了一种始终在线(always-online)的文化,有助于延长工作时间,并将新的、通常是无偿的劳动形式整合进价值链(value chains)中。此外,为了资本的动态利益,他们也透过增加工作场所中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分配,与重组的效率和弹性来加强劳动。就特定的劳动力来说,像是Slack之类的媒体应用程序,支撑了逐渐朝向自动化、对话导向和探索形式的工作形态的变迁发展,从而将传统管理职务转移到方案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身上。接着使用各种形式的演算反馈应用程序和评估工具,来确保拥有传播生产方式的人,仍可以控制和指挥这种「自动」的传播合作工作。

> 传播即生产

将传播和劳动联系起来的第三个选项有点违反直觉:把传播本身看作是工作和生产。如果我们假设传播和劳动具有相同的结构,并将二者视为客体化的活动(objectifying activity),整合到共同的框架之下,那么这将变得合理。人类合作地使用工具、(原始)材料来生产物品,并在遭遇物质世界主权的抵抗时,发展并提升自己的主观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Marxist anthropology)的出发点,认为人类是积极的、客体化的、恰当的、会学习事物的社会生物。传播并不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客体化为物质对象,而是透过传播手段,对符号、象征进行劳动(Raymond Williams),也就是透过其他符号、象征、媒介去产生讯息——「in-formare」一词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其拉丁语起源中具有「形成」或「使人印象深刻,并告知他人」的意思。必须挪用或解码客体化的符号或编码意义(encoded meanings,此词出于Stuart Hall与英国文化研究),才能发生这一点:传播并不是构建了物质世界,而是构建了传播者自身和其他主体的心理调节。人们只能透过对符号劳动进行传播沟通,而每一次互动即使是最立即的互动,实际上都是由这个象征性的物质世界所中介。

例如,思考一下一些独佔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Facebook、Instagram、微博(Weibo)、Snapchat、TikTok等,其中被诱拐进入平台的用户。他们在平台给予的框架内,积极地进行通讯交流,但同时也剥削了产消合一者(prosumers)。他们传播通讯物化的对象不

>>

断将数据痕迹留下，并在他们以监视为基础的商业模型中的社会媒介资本里增值。一旦没有网路用户的通讯活动和他们物化下的处分权(expropriation)，就不会有商品可以出售给广告业，也不会为商业社交媒体带来任何利润。在劳动／传播与资本之间这种不平等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中，资本让我们更努力，更密集地使用数位媒体。资本引导我们通讯传播的行动朝向广告和消费主义发展，用户活动因此被纳入资本之中；社交媒体资本是一种「死亡」的通讯传播行动，由富有的社会阶级控制以进一步剥削他人。

然而，社群媒体资本背后的利益不仅利用了传播通讯，复制出有利于自身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同时也扩散到了更普遍的数位异化形式。在一个经历我们通讯传播活动下的大数据和演算法时代，如果不深切地挑战数位资本主义下潜在的政治经济，就很难维持、甚至想像一种人道化资讯的自我决定形式。而对传播客体的剥夺(剥夺传播对象的权力)及传播通讯活动的异化，已经使我们成为数位时代中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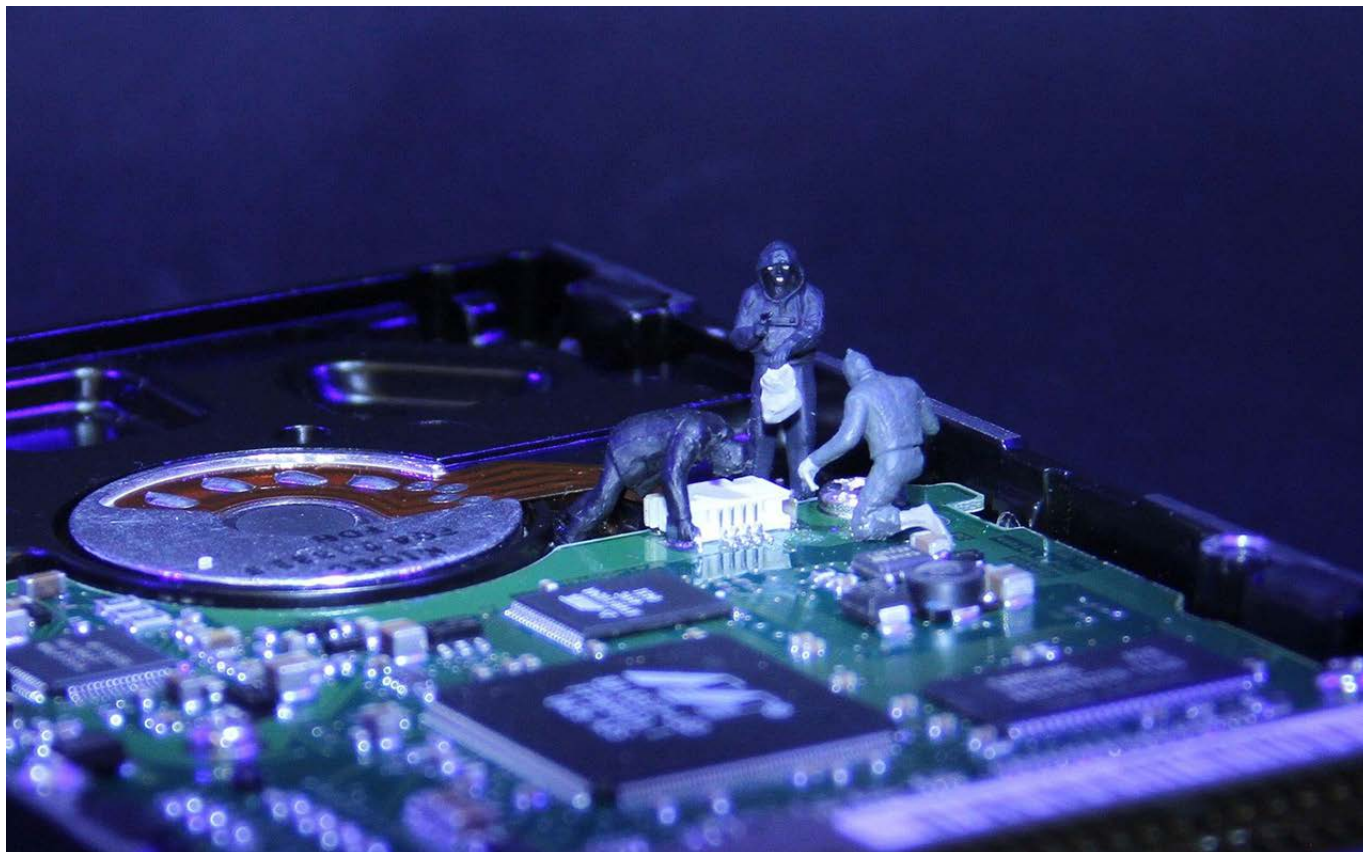
借由将媒体文化的分析扩展到媒体内容与效应之外，文中提出的人文主义整合取径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传播性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并批评全球文化劳动的不均衡分布。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注意到，从全球媒体资本下剥削和异化的共同经验中，团结时刻出现的可能。探究全球资本主义中各种矛盾现象如何形塑通讯传播和劳动的形式，以及它们如何促使变迁发生，仍是媒体和传播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要继续进行的重要课题。■

来信请寄至：

Marisol Sandoval <marisol.sandoval.1@city.ac.uk>
Sebastian Sevnani <sebastian.sevnani@uni-jena.de>

> 自动化与资本主义

Mark Andrejevic, 莫纳许大学, 澳洲



自动化：创造一个为人类服务的物质世界？
摄影：Franck V./unsplash.com. 创用CC。

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自动化」不受社会关系的束缚，并形塑了一个，只以服务人类为目标的物质世界想像：房屋、工厂依循着人们的需求设计并运作，当走过自动门，空间中便立刻有音乐播放，甚至跌倒时，也会有东西主动接住我们。然而实际身处于当代社会关系中，自动化的物质形式却更像是某种反乌托邦的、近乎于异化的化身。我们如今知道，自动化系统更构筑了我们的资讯环境，例如平台上串流的音乐、充斥我们信息流的新闻、显示于搜寻结果的无数笔资料等等。；我们也知道，自动化系统经常被用于提升我们的工作环境与表现、个人信用，甚至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现象何以被自动化系统达成。

由于我们正尝试为自身建立一套互动的基础设施，自动化对于社会领域的发展日渐重要。也因为其自动生产出的数据与资料庞大无比，我们只能透过自动化处理的方式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讯。随着世界受到数位资讯的重整与配置，自动化必然将随之而起。

因此，对于媒体研究者而言，自动化如何以资本为优先、并因其而改变形式，将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再加上不久之前，自动化系统曾被誉为民主与大众赋权的先锋，这个问题更值得受到关注。

互动(interactivity)一词的使用率在千禧年左右到达高峰，并在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被自

自动化的发展「前景」逐渐取代——这并非巧合，其也正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这样的主题反复出现，并持续对抗着资本主义。近几年来，剑桥分析公司的事件引起大举波澜，反对「监视资本主义」的声音也逐渐壮大，然而若要产生实际的影响力，我们便应该重新以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为焦点。除此之外，身处于媒体的脉络中，自动化系统对于资讯环境的形塑，也应是首要关注。我们该问的不是要不要自动化，而是如何自动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将自动化的逻辑，放置于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与积累的条件下讨论。考虑到科技的发展速度，其中一个思考的切入点是去探究形塑自动化做为巩固权力、加强控制的无数种方式背后的运作逻辑。以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便能追踪最近的这些发展有何连结，并确认未来将朝何处前去。这样做的目标当然并非直接反应，而是要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应该设想的是如何以共享优先为科技发展守则，而不是向下一代的祖克伯格或贝佐斯举手投降。

我们也许可以先从目前条件下，自动化互相扣连的三个特质出发，并检视其内涵：抢佔先机(preemptive)、无框架性(framelessness)，以及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

抢佔先机指涉的是针对自动化资料收集与采集(mining)愿景的运用，以及对于风险的管理。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例如亚马逊网路书店早就透过慾望的预测，得知顾客会想购买什么产品；警察则透过预测分析建构想像，在犯罪发生之前便予之击溃。新的自动化保安系统则能够在某些具攻击性的机关已经启动、却还未造成破坏时，便预知其造成的冲击。自动化抢佔先机预测的时间间隔仅以毫秒为单位，仅需要短短这几毫秒，系统便能抢在冲击发生前做出应对。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抢佔先机都需要借由感知与自动化数据收集来达成。透过全面性的数据收集器和感应器，才有可能抢在顾客与罪犯之前，尽可能地掌握清楚他们的相关资讯，以预知他们的想法。唯有将一切收为己有，抢佔先机的目的才得以完成，这凸显出其与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全控监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无框架性同时描绘了以数位化的形式强化世界的所有一切、不留任何一部份地的企图，以及持续不断寻求各种应用数据的方式。在人们发现数据能办到的事情多么惊人时，数据关连性的惯用框架便遭到瓦解——例如在网路浏览器上填写求职申请，比起填写纸本表格反而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工作表现；又或着字迹与打电话给母亲的次数，开始会影响我们的声誉。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性解释相较于机器给出的互相关联性，成为人们看不上的选择；前者以描述特定变量为何具有相关性来重新加强特定框架，后者则认为要抛弃这些。正如 Chris Anderson 在其报告所述，「什么样的人行为理论都没有用，从语言学到社会学都是。忘了分类学、本体论和心理学吧，谁在乎人们为什么要做出任何行为？重要的是他们做了，而我们如今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纪录、测量。只要有了详细且足量的数据，数字本身便是可以说话的。」

根据 Harun Farocki 关于「操作」图像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一切称为「操作主义」：资讯是不需被解释的，因为它作用并产生了结果，而这并不需要解释。只要你使用了正确的浏览器、文件中没有错别字，你就能够获得工作或贷款。当你符合了操作模式，不管你是谁，都会被逮捕、升职或受到标记。

抢佔先机、无框架性和操作主义的逻辑，构成并贯穿「自动化」的运作过程，从贩卖商品时针对性的广告投放，到杀戮时无人机的对象锁定，无一不适用。以此逻辑为前提下，拥有掌握数据与处理的能力与权力，便是掌握了更高的权力位阶。自动化数据收集需要透过自动化处理，以及自动化回应的设施来达成。与此同时，这样的逻辑也标示出反抗的可能，人类本身必定具备的有限性，便为其带来了挑战。权力的目标是要去掩盖这样的事实——无框架的野心事实上是过于宏大且不可能被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完美的强佔先机，也无法抛弃对于数据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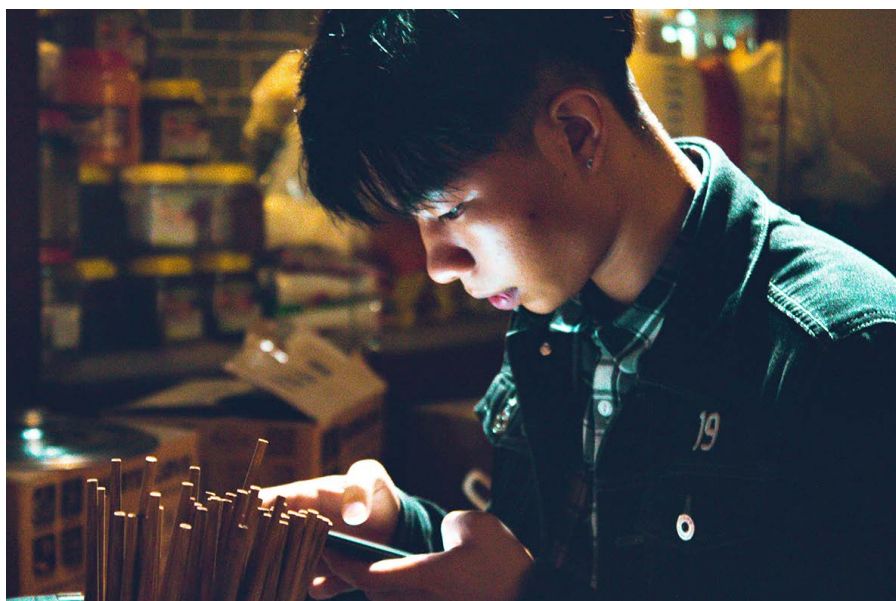
来信请寄至：

Mark Andrejevic <Mark.Andrejevic@monash.edu>

> 时间性

与中国数位劳动阶级的形成

Jack Linchuan Qiu, 中文大学, 香港



数位科技已经无所不在。他们可以用来控制，也可以用来发起反抗。摄影：Owen Winkel/unsplash.com. 创用CC。

中国当局透过数位媒体平台、行动定位服务和人工智能(AI)等技术，大幅地增进社会控制的力道，掌握人民的移动及变迁中的城乡地理资讯。此篇文章则试图说明，若是将以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观点，检视中国数位劳动阶级(digital working class, DWC)如何形成与瓦解，可以发现针对北京的控制，事实上正逐渐被削弱。此处的「阶级」，同时可以用马克思与韦伯主义者的角度理解，并分别对应着「革命时代」和「消费时代」。

革命与消费是两种对立的时间性模型：前者具有破坏性、集体性、反资本主义、前瞻性、英雄主义的和超历史等性质；后者是连续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现在论的、褻渎的和非历史的——于此分别参考Richard Florida的《The World is Spiky》以及Thomas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将前者称为「尖时间(spiky time)」，后者则称为「平时间(flat time)」。

本文之所以会选择中国的劳工阶级为对象，是因为他们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往往生活在更复杂多元的时间性中，因此提供了一个较

为广泛综合的时间性秩序——多重秩序共存且具内部冲突，使我们得以检视平时间和尖时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在 Raymond William 的框架中，尖时间和平时间分别处于磁场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各种时间性。这些时间性各自具有残余、主导和显现浮现等性质。平时间被Manuel Castells 称作「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其主导了DWC日渐数位化的日常生活；尖时间则在其相对破碎的时刻中，潜伏于残余、又显现于变动的力量之中，并在平时间的平滑表面上穿洞。平时间促使劳工追求他人的梦想、生活于原子化环境中，使其遗忘自身的身份能够形成工人阶级的团结；尖时间则协助了集体抗争以及DWC的阶级形成。

尖时间与平时间也有其相似之处。相较于过去中国政权以线性时间为特征，例如儒家的倒退(regress)、佛教的轮回转世、现代主义的可预期进步，尖时间与平时间皆非如此。平时间既非倒退也非进步，更非循环；尖时间是由 Stuart Hall 所说的「无保障政治」创造，其处于进步与倒退的碰撞产生的锯齿状边缘。

>>

尖时间和平时间皆因其共时性而强大。例如2018年全国卡车司机针对中国长途卡车运输平台运满满发起的罢工，其性质就如同美国西部城市对 Uber 进行的抗争，只是规模更大、遍及全国；又例如中国每年11月11日的电子商务狂欢节「单身节」，每到这天，各阶层的消费者皆沉浸于网购的狂欢之中。由于社会结构所促成的自发性行动，劳工们一年中可能会有360天生活于平时间中，却会在另外的5天中生活于尖时间。

Judy Wajcman所说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指的正是上述这些时间概念的不同向度，例如尖锐、平坦、儒家、佛家、现代主义等，他们具有定义时间性的最终权力。时间以何为基本单位？基本单位之间如何连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时间整体？

在传统的时间概念中，儒家预设了超然君主的存在，现代主义的时间性则在中国脉络下透过国家主义展现，其中包含着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即便中国共产党以现代主义的时间性行使统治，尖时间和平时间皆挑战了国家主导的时间体制，并借此为非国家行动者创造时间空间，例如企业所对应的平时间，以及激进派的尖时间。

在中国现今世俗化、个体化、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时间性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智慧型手机与网咖多少带来了一些创新，不过考量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劳动阶级的集体经验，历史的延续性仍然是多过其断裂的。

在多数情况下，劳工必须要依照老板要求行事，如依循着工厂的工业时间，或是公司营运媒体的平时间。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面临着生存威胁，DWC会以另一种时间取代原本的时间，而在取代的时间中，劳工是得以主宰时间的。在数位时代中进行停工、暴动、罢工等阶级抗争的关键，便是建立尖时间，以此取代原本的时间制度。

平时间的兴起是一个以全球为范围的现象。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农场大量制造假新闻、民族主义迷因大肆流行，这些构成了 Adam Greenfield 说的「后人类日常生活」。平时间是一体两面的：对消费者而言，它应该是「自然的」、受到数据科学和华尔街法则支配的；对资讯技术公司而言，被公司捕获的平时间成为其私人财产，并在操纵、货币化时间的过程中使其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料。

当这样的全球性趋势发生于中国，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退缩。在毛泽东时期，透过学校、大众媒体、定期政治动员，中国以其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时间的国有化；自1992年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导着空间规划，其大型基础设施甚至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当局似乎未能保持对时间的掌控。

做为一个政党型国家，中国政府对于主导时间，并非毫无尝试。然而事情并没有依照政府所希望的发展，时间的掌控权反而从国家政府转移至私人企业手中。对劳工来说，没有任何政府所主导的活动胜过「单身节」这个购物节庆。国家时间几乎是以一种残馀的状态存在。习近平的仪式性展演，使其如神一般的人物形象，都变得微不足道——连一个人群为习近平鼓掌的镜头都能持续好几分钟。这显现出现代主义下的国家时间已经被掏空，由平时间取而代之。

2004年对中国的劳工而言，代表着网路革命时代的回归。陕西、四川和广东的三起抗争，突破了地方政府对论坛和部落格的资讯限制，自此之后，掌握了数位媒体的劳工在对抗老板和政府威权时取得胜利，已经不再是特例。2010年的本田锁业罢工，以及2014年的裕元鞋厂罢工，甚至是2018年发生的佳土工潮，都是其中的案例。

我最后想要以 Giorgio Agamben 提出的「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以及「顺时性时间(chronological time)」这两个概念之对比来总结。他对这两种时间性的描述，与尖时间和平时间的对比非常相似。Agamben 提到，「弥赛亚时间并非外于顺时性时间，其是顺时性时间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会经历某种压缩、收聚，并在此过程中完全地改变。」对中国 DWC 来说，弥赛亚时间已经开始发生了。随着数位媒体的广泛传播和平时间的主导位置，尖时间被折叠于平时间的内部，也因此，革命时间的起始往往难以被注意到。革命正是在这种被遗忘的、没有人注意到的任何时刻中发生的。■

来信请寄至

Jack Linchuan Qiu <jacklqiu@gmail.com>

> 美中抗衡？

数位科技与文化工业的战争

Tanner Mirrlees · 加拿大 Ontario Tech University



美国的经济与文化霸权来到尽头了吗？
来源：维基百科创用CC。

从美苏冷战，一直到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因经济萧条而被迫终止，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强大帝国。然而最近，上至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下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皆认为中国可能动摇美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掌控。美国纽约时报和南华早报，分别以《美国 vs. 中国：无边际的大国竞争时代》、《美中对抗逐渐升温，东南亚不选边站队的日子将要结束》等标题，将美国和中国描述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不过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长期以来，美国以的三大结构性力量为支柱：全球经济实力、军事霸权、科技与文化的普及。即便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及「软实力」正逐渐成长，不过中国还不能真的被称作一个「竞争对手」。2019年的美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战胜了美国，在数位技术与文化产业面向上更是如此。

根据富比士的全球前两千名企业排行，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共有575间，中国则只有309

间；前20名企业中，有10间是美国企业，中国企业仅两间。佔据了全球外汇存底与金流的币种是美元，而非人民币；美国的名义GDP更是以19.39兆美元，胜过了中国的12.24兆美元。在国防预算上，中国是1850亿美元，不敌美国的6846亿美元。美国的这笔庞大资金，由全球最大的武器生产／出口商接收，包含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等公司。除此之外，数百个美军基地遍布于全球，从韩国大邱空军基地蔓延至德国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最近甚至于印太地区扩张，以包围和遏制中国。相较之下，中国的全球军事工作显得微不足道，仅有一个外国基地设置在吉布提(Djibouti)，距离美国还很远。

作为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基础，其数位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规模、影响力、利润和实力都比中国庞大许多。在全球154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65家是美国公司，20家是中国公司。前十名中有八家是美国公司，包含苹果、微软、Alphabet-Google、英

特尔、IBM、Facebook、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和甲骨文(Oracle)，腾讯控股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中国公司；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电信公司分别是美国的 AT&T，以及 Verizon，第三大的才是中国电信公司。20 个最常被14岁以上的人使用的网站，皆设置于硅谷，包括垄断了搜寻引擎业务的 Google、社群网路巨擘 Facebook、影片平台YouTube、数位微型部落格推特、百科全书网站 Wikipedia、娱乐串流平台 Netflix、电邮网站Yahoo 和 Outlook、摄影共享平台 Instagram、论坛 Reddit、色情网站 Pornhub 和 Xvideos等等。中国的网路公司确实正在成长，但目前只有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两个网站——百度和 QQ。

全球票房并非由中国，而是由好莱坞五大制片公司——迪士尼的华特迪士尼和20世纪制片、AT&T-WarnerMedia的华纳兄弟、Comcast-NBCUniversal的环球影业和ViacomCBS 的派拉蒙影业所支配；好莱坞2019年的总票房由北美票房的114亿美元以及国际票房的311亿美元，创下了 42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政府借由限制其大多数电影与电视节目是「中国制造」，以保护并促进其国内娱乐产业的发展。我们不能说中国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中美之间的文化贸易关系确实是不平衡的；好莱坞电影每年都能在中国大赚一笔，中国电影却很少在美国院线上映，也无法获得相近的票房与利润。2019年最卖座的电影《复仇者联盟2：终局之战》在中国创造了30项票房纪录，中国大片《流浪地球》在美国却一个票房纪录也没有——简言之，中国的全球娱乐产业完全无法匹敌好莱坞的跨国利润和文化吸引力。

硅谷和好莱坞每年为美国GDP贡献数十亿美元。数位媒体平台满足了资本主义创造消费者，并诱使其继续购买大宗商品的需求。作为全球最大的数位广告商，Google 佔全球广告支出的 31.1%，即1037.3亿美元；Facebook 以673.7亿美元的净广告收入位居第二，第三名才是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 292亿美元，第四则是亚马逊公司，约141亿美元。好莱坞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也服务了资本主义的广告需求。这些产品的核心是体验与文化商品，经制片公司制作后卖给分销商，再分发给各种影像传媒展览的参展商。每部好莱坞作品的推广费用，约落在2000万至1.5亿美元间。全球的广告商也会向好莱坞付费，

让其在影片中置入商品。《蜘蛛人：离家日》便以2.88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创下品牌置入的纪录，让你在观赏蜘蛛人大战神秘客的同时，还能享受奥迪、百事和联合航空公司的商品置入！《怪奇物语》第三季则以可口可乐、汉堡王和肯德基的置入性行销，取得了1500万美元的广告收益。

美国数位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运作，除了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也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企图有关。为了确保硅谷和好莱坞在其他国家的盈利，美国国务院推动文化和数位自由贸易，以严格的知识产权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局则利用大型科技公司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模型监控全球人口，并将其活动以数据形式保存，以分析、预测其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办公室在新旧媒体上开展亲美运动，以巩固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国防部将网路和社群媒体作为「网路战争」的「武器」和「战场」，并与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公司签订合同，进行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军事研发。美国国安的所有相关部门，都与其文化产业环环相扣，甚至经常协助好莱坞制作以国安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如中央情报局便协助制作一部以冷战题材的电视剧《美国人》，前特务 Joe Weisberg 也是编剧之一。国防部与好莱坞共同创造了许多「军事商品」，例如《捍卫战士：独行侠》、《惊奇队长》和《变形金刚》。

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数位技术和与化产业的资本主义逻辑，如何与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行动之间互相融合，在我参与编辑的著作：《心与矿：美国帝国的文化产业(Hearts and Mines: The US Empire's Culture Industry)》(2016)，以及《媒体帝国主义：连续性和变化(Media Imperi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2019)中，有更为详细的内容。总而言之，美国的国家机构、数位技术和文化产业正建构、保护、促进一个由同盟国组成的全球体系，其由美国军事安全体制监管，受到硅谷和好莱坞的支持，并透过美国的流行文化和媒体平台向外扩散。中国的确正不停扩展其软实力以及数位军火库，也试图创造文化影响，但现在的中国仍然不是美国帝国的对手。■

来信请寄至：

Tanner Mirrlees <tanner.mirrlees@uoit.ca>

> 自由市场

会促进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吗？

Mandy Tröger,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德国



1989年9月于柏林的示威游行。
摄影：Peter Zimmermann/Bundesarchiv

针 对1990年春季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新闻市场的发展，西德联盟杂志Publizistik & Kunst 称之为「淘金热」，而报纸 die tageszeitung 则认为这提醒人们「早期的资本主义」。然而，西德的政治经济团体为自身利益建立的市场结构，却深深阻碍民主媒体改革。

仅五个月前，1989年11月，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上街抗议国家的无情镇压，并以建立自由民主的媒体为诉求。这些抗议活动推翻了柏林围墙，并在媒体上掀起一波逐步改革的浪潮。最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90年10月3日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使德国统一。有关统一已有很多研究，而过渡时期也已过去，这篇文章强调，早在1990年五月，德国媒体市场已经有效整合。

> 改革

1989年11月，最初的媒体改革目标是打破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资讯垄断。当时SED持有东德报纸总产量的70%。早在1989年12月，东德部长理事会就批准一项决议，支持反对派团体平

等的接触媒体。不久后，在1990年2月5日，《意见、资讯与媒体法案》禁止审查制度，并宣布新闻媒体圈摆脱政治经济垄断，因而成为公开辩论的开放平台。这意味着东德统治下的每个人民与法人都有权利发行、印刷与分发媒体。

随后，新兴报业公司爆炸式增长：光1990年2月就已成立16家报纸；1990年7月则为100间。在一个只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这波报业成立的浪潮代表着结构改革与民主参与。同时，老牌报纸宣布将独立于政治与进行内部改革。此外，在新闻编辑室、报纸与致编辑的信中开始对新闻界真正自由地进行辩论。

同时，东德设立几个机构专门监督媒体改革。例如，无党派基础的媒体控制委员会（Media Control Council, MKR）与媒体政策委员会（the Ministry of Media Policy, MfM）在1990年4月成立。媒体部长Gottfried Müller在1990年5月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确保“通往媒体自由的培育转化”，而非「随意地采用或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或概念」，其目的是为新闻自由挖掘新模式。

>>

> 市场接管

在进行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的同时，西德媒体公司已经开始扩展东德市场。早在1989年12月，出版商就在东德发送他们的出版刊物，原本零星的出口很快就转完系统化。至二月中旬，西德内政部（BMI）已经认为媒体业有监管的必要：因为他们未缴税，也未明确定价。但是，BMI“明确认可这些「法律上灰色地带的出版行为」，因为能够确保资讯流通，进而去影响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自由选举，这场选举由西德政党提供大量资金。由西德市场利益所形塑的媒体业转型，于此奠下政治基础。

1990年3月5日，主要出版社Springer, Burda, Bauer 与 Gruner + Jahr (G + J)开始有系统地进口。他们设立自己的专属系统，将东德分为四区，主要发行自己的出版刊物，并充斥整个东德市场。然而，这违反联邦法律，在东德的政治与公民机构亦引发恐慌。因为该计画在选举前两周实施，东德政府来不及采取行动，尝试监管都被拒绝或忽视。

选举后不久，这些出版商的目标转为透过使用掠夺性订价来获得竞争优势。这项亏本生意的目标是为赢得未来的读者。然而，这排除掉无法负担得起这样价格的西德小型出版商，并给东德报纸施加更大的压力：过时的印刷技术、缺乏纸张与不可靠的发行基础设施使其难以竞争。此外，东德在1990年4月1日终止对报业媒体的补贴。大多数报纸的价格翻涨二至三倍，并迅速转往广告，使得西德媒体的专业不可或缺。不仅需要资本投资外，还使东德在早期发展报业时产生对西德的依赖。

> 两国一市场

至1990年4月，所有东德报社都与西德出版商进行合资谈判，以在东德获得竞争优势。主要对象是14间前东德地区报纸，在各自区域有着半／准垄断的地位。这些报业签订正式的合约意向书。但是，事实上，西德出版商建立的商业关系，范围从收购报纸商到印刷报纸，还包含股权投资。直到1991年4月，这些合资企业才被德国政府的信托机构（Treuhandanstalt, THA）转变成合法的合约。THA 毫无改变的将原本国有的媒体业交给西德的主要出版商，使得这些出版商很快就进一步巩固市场。

> 梦幻幻灭

最终的结果是媒体聚集：1990年成立的120种报纸，两年后仅有大约50家出版社与65种报纸。至1992年11月，剩下35家出版社与50种报纸。对历史学家Konrad Dussel而言，这是联邦政府「反对任何实验」决定的结果。这也意味着1989年民主梦的消亡。对于如何基于东德的经验重新思考新闻自由、思想与倡议都已经超出限度。这使过渡时期失去机会之窗，而两德统一仅是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扩大，而曾拥有主权的东德，媒体却从未有好发展。■

来信请寄至：

Mandy Tröger <Mandy.Troeger@ifkw.lmu.de>

> Juju: 资通技术的 非洲启示

Francis Nyamnjoh, 开普敦大学, 南非



| Arbu 绘。

我从小在中西非长大，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超自然、人类、人类的行为与成就等一切事物，皆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事物普遍是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相信越早认知到并接受这件事情，对一切来说都会是比较好的。我们认为由于这样的不完整性，即便在当下看来，人们在形式与内容上可能呈现出个体化或群体化的性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不完整性与现实的本质，便是流动性(Fluidity)、存在的混

>>

合性(compositeness of being),以及同时以整体或片段呈现的能力。更进一步来说,互相连结与互相依赖的行为,在中部与西部非洲是被推崇的;人们认为不管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超自然的事物之间,都应该以这样的模式为互动基础。

> 关于不完整性

在「不完整性」的概念下,中西非的人们期望能够透过与他人的关系强化自身的存在。人们会利用想像力与创造力,以特定具有「魔力」的物品,作为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媒介,借此将自己的存在与关系与互动中延展。这里说的具「魔力」的物品,以现代的说法来说就是「科技(technologies)」,不过在中西非的在地语汇中,我将这样的魔力物品以 juju 一词来粗略地指称。这样的宇宙论与存在论,形塑了中西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概念的实践。然而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这类行为以巫术、黑魔法、邪教、迷信、太过原始等词汇来描述,不管在非洲的学生、观察人员,甚至是非洲人自己举办的活动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矛盾的是,对于那些将现代化与发展视为零和游戏的人,即便是被当代科学革命奉为圭臬的资讯与通讯技术(ICTs)潮流,也无法成为能够影响这些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因素。

当然,有些人拒绝承认自己对其他事物带有亏欠,怀抱着征服与支配的野心,不过在这里我们先撇开这些事情不看:未来应是站在这些被看不起的信仰,以及由不完整现实带来的生活实践一方的。如果将自然状态下的普通人类视作不完整的,不管是透过社会关系或是借用科技来强化自身存在的行为,都难以真正使其完整——这些行为反而指出了他们的混合性,以及对其他人类、自然超自然等他者的亏欠。不完整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当面对所有人们还无法完全掌握的延伸形式,为了修复自身的不完整状态而寻求自我延伸只会一再地认知到自身的不完整。甚至,大部分的延展并非所有情况中都能够完整地发挥作用,某些时候延展反而会削弱个体对自我完整度的认知。完整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其使人产生毫无意义的竞争与零和游戏心态——这促使我们探索、思考,并试图追求一个开放式的、互相连结的、流动和共生的世界。在这样的理想中,没有人能够垄断权力、没有人是无权的,人与物将相辅而存。

强调互相连结与依赖,将促使我们系统性地消除自身追求优越的零和心态,并最终使我们接受不完整、接受其作为一种正常的存在(being)状态,甚至作为一种成为(becoming)的状态。

> 数位科技作为juju

关于那些无形的力量,就如Chinua Achebe 在其《神之箭(Arrow of God)》中所述:「当我们看到一只小鸟在道路中间跳舞时,我们必须知道它的鼓手就在附近的灌木丛中。」人类为了能够宣称自身拥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性,必须追求借由不凡的活化剂——juju——以提升平凡自我的方式。在中西非,人们普遍认为自身的神性可以透过包含巫术、药剂等 juju 获得增强,而这类物品通常会由先知或具灵力者(这类人士在不同脉络下会有不同的称呼)特制而成。

因此我认为 ICTs 或数位科技与 juju 事实上是相似的。在中西非地区中,人们对于不完整性、混合性、同时于所有地方存在的能力抱持的信念,反映出一件事——要如何更好的去理解与运用当前资通技术的创新进步,还有许多可以从过去学习的部分。作为数位人文学科的学者,我于此诚挚地邀请你一同深入了解这个议题。数位技术使得人类与事物得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存在,或着在没有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存在,这与那些被称为巫术和魔法的事物其实并无不同。这样的信念带出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世界,在此世界中,一个事物能够同时有多个存在,并且有着重新定义现实的永恒力量。中西非的大众世界是一个具有弹性、流动性和不完整性的世界,却被殖民国忽略,并持续于今日被现代主义者蔑视,在这个世界中,时间与空间是不能阻碍真理与其微小复杂性的。网路、手机、智能手机等资通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即时性与可触及性等「魔力」,并使人们更加倾向出现自恋、自我放纵和保持形象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资通技术的发达,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才得以进展。不同于二分法的思维,中西非地区透过创造性想象形成自我延伸的传统,假定了一种互相连结的本体论——这也许会将人类与资讯通讯技术之间的交织性理论化的有效途径。

我认为juju是关于自我活化与自我延伸的一种科技，其能够赋予我们一些原本没有的能力，我们得以完成原本难以触及的事情，并使我们不再只是「平凡」。如果经过良好的培养与磨练，我们的身体是有着成为juju，并取得非凡成就的潜能的。但即便是经过技术性训练与规训的、程序化的身体，也会遭遇到无法依靠自身跨越的困难，需要透过自身以外力量的帮助才得以达成。总而言之，我们的身体有着成为juju的潜力，但最终仍需要额外的juju，以增强我们本身的行动。

Juju通常会需要透过复杂的连结网路来运作，这个特性凸显出其谦卑的性质，并且制衡了傲慢倾向的壮大。就算是将较为「科技」的 juju，如电脑、手机等行动设备装置于自身，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突然失效。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怀抱着juju信念的中西非男人与女人，并不排斥将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现代科学化技术，与他们的「非洲电子产品」一同使用。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得以同时与村内、村外甚至其他洲的客户互动，透过将传统与现代的 juju 融合，进行自我活化与延伸。

依赖于juju、符咒、巫术或先知也许被视为原始、不合理的行为，但是面对自身的不完整性，这些便是我们获取能动性的一种方式。以这一点来说，就如前面的段落中我提到的，juju与那些被认为更加现代、科学、理性的科技并没有什么不同；照片、电脑、网路、手机、智慧手机、大众媒体、社群媒体、书籍、电力、洗衣机、人工智能、核武器，都只是一种自我延伸。不管你身处于法国、加拿大或比利时，只要在Google搜寻「Marabout公司」，不仅可以找到塞内加尔、马利或尼日尔的 Marabout 官方网站和联系方式，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办公室、代理人、电话号码和行事历。以喀麦隆为例，占卜师会用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聚集离散的喀麦隆人，对于他们由于破碎的关系而产生的痛苦，进行占卜或解答。

> Juju：必要之恶？

于数位科技与演算法的时代，我们见证软体工程师惊人、诡谲的强大力量正不断增长。如今透过木马程序的安装，骇客能够在远端将我们的加密讯息破解，甚至能在我们不知情的时候打开

麦克风和镜头。这些制造木马程序的人，事实上无异于中西非丛林灌木中的灵媒，他们鼓励客户或信徒陷溺于观看他人全貌的、狂热的权力之中。

就如同生命本身便充满不平等，以及不平等所构筑的阶层，juju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如果有人拥有较为强大的juju，它便能比起其他人有更强的能力去看、听、闻、感知到那些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也就更容易能够影响并控制自身以外的人事物。Juju可以单独使用，也能与其他 juju 组合使用，以最大化其效果。如果你有拥有一个强大的juju，就算不在场，也能有效地对其他人产生作用，无论那样的作用本身是好是坏，是出于爱还是恨。在社群媒体时代，拥有应用程序和联络资讯的智慧型手机，便能很好地呈现出这点——作为时下的强大juju之一，智慧型手机使人们能够使用热点、蓝牙等功能，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

即便生活本身便具矛盾与可控制的性质，如果没有juju所带来的创造性，以及因其而生的冒险与刺激感，生活本身将不再有难以预测的变动性，最终成为标准化、重复的平凡；个人与社会将失去即兴发挥和自我创造的能力，并且不再有创造性的理念出现。这凸显出juju 对于社会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个人和集体都会试图使用juju影响、控制人与事物；没有juju的人们，将无法克服逆境。

Juju的普遍性，也正显示出分散于许多个体身上的力量，虽然容易出现，却也很容易于瞬间消逝。不管本身多么强大，人们仍总是寻求自身身体上的延伸及感知，并试图以 juju——就如科技与技术一般——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增强。这使我们得到启示：人类所需要培养的特质，应是同时能包含「内部」与「外部」的。■

来信请寄至：

Francis Nyamnjoh <francis.nyamnjoh@uct.ac.za>

> 在菲律宾 「做社会学」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以及ISA偏差行为委员会(RC29)、女性、性别与社会委员会(RC32)成员



本期的《全球对话》呈现来自菲律宾社会学学会 (PSS) 成员对不同议题的讨论, 包括都市化及治理、LGBT运动、毒品战争中的暴力行为、在贫穷社群里实践公共社会学, 以及民答那峨岛的边缘化。分别来自吕宋岛、维萨亚斯群岛和民答那峨岛三个独特的岛群, 他们将讨论彼此的研究兴趣, 并思考菲律宾社会学者今日所面对的问题。

Louie Benedict Ignacio处理了菲律宾的都市化议题, 他指出马尼拉都会区的都会化动态过程。马尼拉都会区就是构成国家首都区的数个周边都市。随着都市的贫困加剧、贫民窟增加, 门禁社区 (gated communities) 兴起的成因已经从提供经济安全转变为确保特权住户的人身安全。Ignacio提出的都市化危机, 不只伴随着资源及交通管理的共同问题, 还有社会分化及治理衍生的问题。

John Andrew Evangelista研究了如何运用酷儿视角来理解菲律宾LGBTQ运动中各团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依循着多元的意识形态, 人们针对不同议题提出了各种主张: 例如认为应倡议反歧视立法, 并改变现有经济体系, 或是认为同志游行应着重于派对性质。他认为, 在建构LGBTQ运动的历史过程中, 所产生的矛盾及冲突空间, 显示了运动各个环节的差异是历史产物, 而非基于对立的利益冲突。

Gutierrez介绍了毒品战争中的暴力行为, 该事件在菲律宾引起了数千位「毒瘾人格 (drug personalities)」死亡, 并出现了不同调的叙述。菲律宾公众对于反毒品运动的支持, 和对于人权

侵犯及被补毒品嫌犯针对警察暴力的论述, 两者相互抵触, 但也确认了后者视该运动为毒品问题解决方案的看法。随着话题逐渐依不同视角开展出多元的论述, 社会研究者的观点必须超越以下观点之间的争论: 刑法民粹主义——一种主张对基于公众情绪的犯罪行为, 施加惩罚性措施的观点, 以及刑法菁英主义——一种给予科学的或专家的意见特权, 并认为公众情绪过于简单的观点。

Phoebe Zoe Maria Sanchez的文章批评总统Rodrigo Duterte的威权民粹主义政权, 是1986年追求民主转型的人民力量革命失败所延伸而成。这样的威权民粹主义, 和Marcos独裁统治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 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甚至变得更糟了。Sanchez认为公共社会学可以借由支持贫穷组织, 和解除他们的沉默文化, 来强化他们对公民社会的参与, 并影响国家政策。

最后, Mario Aguja谈到, 相对于菲律宾北方的马尼拉都会区在经济、政治、军事, 以及文化力量上, 皆是无庸置疑的霸权中心, 南方的民答那峨岛是被边缘化的。他视这种核心—周边关系 (Center-Periphery) 为问题, 并以此涵盖社会学实践本身。在民答那峨岛的议题中, 不管是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极端贫穷比例, 还是暴力极端化等等, 皆是社会学可能关注的问题; 然而菲律宾社会学家的论述, 却侷限在和北方霸权中心的利益相符之范围。为了扭转这种偏见, PSS近期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 将年度会议带入民答那峨岛, 将民答那峨岛的社会学家置于全国对话的最前线。■

来信请寄至:

Filomin C. Gutierrez <fccgutierrez@up.edu.ph>

> 菲律宾的都市研究： 以社会学定锚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圣多默大学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以及ISA教育社会学委员会 (RC04)、区域及都市发展委员会 (RC21) 成员



马尼拉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之一，非正式移民在此处是常见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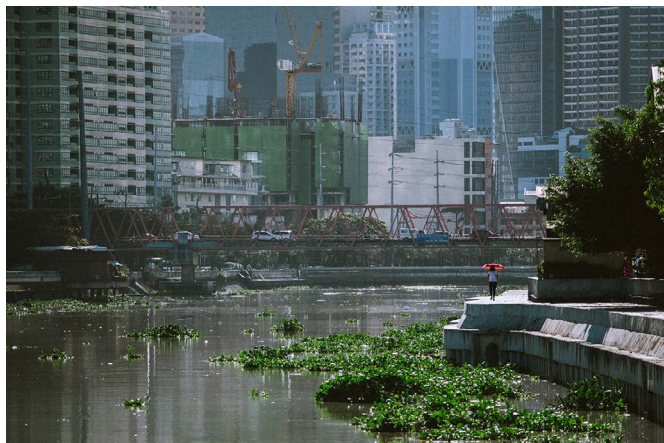
摄影：Rhon Paolo C. Velarde。

菲律宾的都市研究，尤其是都市社会学，从19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当时首都马尼拉和周边都市都开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扩张。在社区结构化和科技进步之前，如今遍布高楼大厦、门禁社区和繁忙街道的区域曾经被绿色的田野、绵延的水流和河流系统所复盖。但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对社区的需求也不断发展，导致其发展已无法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维持。这些变化显示，针对居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需要更复杂的治理。这也引导至对都市生活的各种讨论。都市生活的各个面向，包含房屋和建筑环境、针对居民的经济状况、犯罪行为 and 治理的细分，都需要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理解。

政治上，为了应对这些关注，国家将其部分功能下放至各个地方政府部门，例如地方事务管理部门。在菲律宾，这个权力下放过程是由1991年《地方政府法》所赋予的。根据该法第24条，国家将其功能下放给地方政府部门，以便每个部门依据既定的国家政策、指南和标准，负责提供最小的服务和设施。根据第25条，地方政府单位应提供基本服务，例如适当的通讯和运输设施、教育辅导服务和设施、警察和消防，以及社区发展。

在菲律宾，大都会化的概念一大都会区域和大都会治理—于1970年代初首次提出，目的是协调马尼拉都会区附近的3个都市和13个直辖市的地铁服务。菲律宾第一个大都会治理机构是根

>>



帕西格河延伸于马尼拉市区。
它的水质被认为低于适宜居住的标准。
摄影：Rhon Paolo C. Velarde.

据第824号总统令成立的：1975年至1986年任职的马尼拉都会区委员会。它的功能是协调都市服务，例如交通和运输管理、房屋控制，以及维持清洁和绿色环境。1995年，根据第7924号共和国法案，成立了马尼拉都会发展局(MMDA)，该局对17个都市提供基本服务，并具有规划、监督、协调、管理和整合的功能。MMDA提供的基本服务包含：交通舒缓和提升运输效率；工作管理；污染监测；洪水和污水处理；都市更新、分区和土地使用规划、健康和卫生；以及公共安全、救援行动。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主要特色是全面的都市化，那么在二十一世纪，都会化就是都市治理和都市管理的最新综合方法。都市化伴随着贫穷的加剧，这是因为都市收入和就业机会有限，同时都市人口随着自然成长和农村人口移入持续地增加。这也导致都市的贫民窟兴起。对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的缺乏，也是快速都市化产生的问题，导致环境恶化。都市基础设施和运输设施的不足，形成僵局并限制了经济成长。所有这些都市问题导致1970年代末以来都市的社会结构崩溃，在1990年代初菲律宾恢复民主时达到高峰，后果持续至今。

我的研究试图一窥广泛的都市研究领域，尤其是针对马尼拉都会区。我首先聚焦在像马尼拉都会发展局这样的都市内国家机构，如何解决如交通管理这种都市问题，我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与国家机构官员之间动态的政治互动，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继续关注马尼拉都会区中，市区里的门禁社区如何形成，特别是探讨门禁社区的功能如何从一种经济安全角式演变成一种物理安全角式，并进一步发展为两者兼具。最近，我研究了在都市环境中提供安全保障的动态关系，由于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是受私人房屋组织管理的私有实体，因此为居民提供的安全性高于地方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安全性。透过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方法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借由垄断服务来源，破坏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正当性，同时诱使愈来愈多上层阶级的都市居民选购这种居住结构。

有鑑于马尼拉都会区持续的人口成长——与世界其他大都市带类似，每年稳定成长1.7%——都市地区更多元的理解变得更加重要。菲律宾的都市研究分为不同领域，例如卫生、都市计划与设计、政治与治理、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是风险与灾害。对马尼拉都会区而言，有着1280万人口和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之一，社会学可以提供一个总体的框架，来了解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社会学定锚，可以连结对城市的关注和可能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由基于证据的研究和对城市的热爱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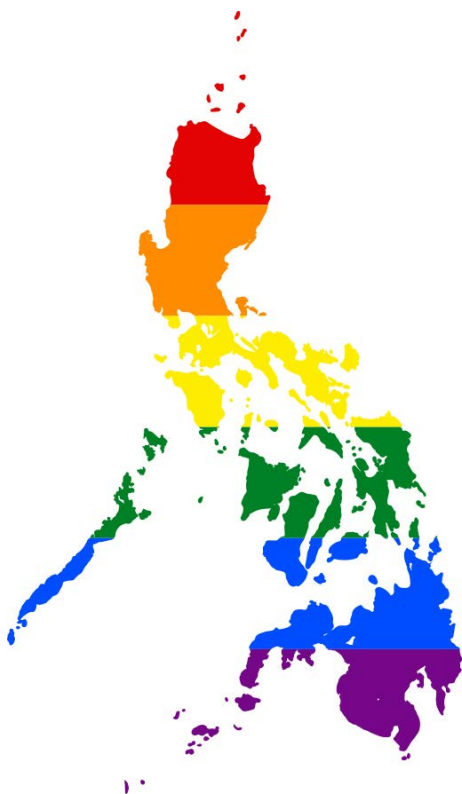
来信请寄至：

Louie Benedict R. Ignacio <lriagnacio@ust.edu.ph>

> 利用酷儿视角 导引冲突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以及ISA女性、性别与社会委员会(RC32)成员

酷儿眼中的菲律宾人是什么样的？
来源：维基百科创意CC。



在他的著作《全球天后(2003)》中,Manalansan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住在纽约的菲律宾籍同性恋男性,他在自己的公寓内制造了一个空间上的区隔。一侧有一个带有天主教宗教符号的祭坛,而另一侧则有裸体男性的照片。西班牙殖民主义在菲律宾人身上留下的宗教遗产,流传到了对LGBTQ族群相对较自由的城市中。这个案例不仅通过刻划同性恋与宗教之间的复杂交会来描绘酷儿特质。它还体现了社会和历史条件如何形塑这种复杂性。

> 陷于中间地带

在其最初成为分析社会的一套框架时,酷儿理论使我们在看待与自身价值对立的事物时,即便不到歌颂,也至少能以从理解的角度出发。为了与父权体制和异性恋常规等正统观念对话,酷儿理论将那些试图抗拒二元性别与性的事件、时刻、认同与文化一一剖析,并尝试寻找能颠覆现有结构的一套逻辑。在这个框架内,身为一个酷儿代表对任何类似正常的现象抱持怀疑。

人类学家Martin Manalansan借由复杂化酷儿特质的概念,来尝试使它具象化。这个工作不仅只是发扬具颠覆性的行为及思想。反之,这项任务是分析偏差与正常交会和冲撞的各种方式。因此,酷儿特质可以被理解为那些看似冲突的逻辑,彼此相遇的复杂空间。这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协助解释行动者面对和协调看似冲突的意义、诠释,甚至意识形态时,内含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就像前述提到的复杂公寓一样,酷儿特质研究者经常发现自己处于矛盾且冲突的空间中。他们觉得自己陷入了对立的解释之间。在我自己关于菲律宾LGBTQ运动史的著作中,我发现自己站在运动者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张力之中。社会运动永远不会黑白分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运动者经常带有各种意识形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及诠释一个主张。如此的紧张关系,正是身为一位酷儿特质研究者,如我,在面对LGBTQ运动时所遭遇的。

我同时以研究人员和活动者的身分参与菲律宾LGBTQ的活动,使自己熟悉运动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有些人强调法律的必要性时,其他人则将性别和性解放与社会主义过渡做连结。有人将恐同和厌女视为个体意识的产物,这促使他们为性平教育争论。最后,部分运动也意识到不同议题间的交集。因此,他们避免了只围绕一种成因和一种解决方案的争论。

>>

这些张力可以从酷儿视角来理解。多元的意识形态逻辑，在运动中相遇，而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为运动建立了一个混乱的形象。在马尼拉都会区的同志游行中，这一点尤其明显。游行者们抱持着各种特定意识形态下形成的主张。当一些人呼吁通过专门的反歧视法律时，一些人也提出需要改变当前的经济体系。另一些人甚至呼吁终止劳动合同制（非典型劳动），同时企业代表正在一旁聚会和跳舞。

透过了解运动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张力和混乱。LGBTQ组织是在1986年Marcos威权政府垮台后，经由几年大型、持续地抗议，开始形成的。行动者不再全神贯注于推翻独裁者政权的终极目标，而是开始冒险进行各种倡议。1987年宪法的制定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促进了法律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致力于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性和性别正义。

除了这次组织的机会外，菲律宾左翼也出现意识形态分裂。一方面，有人认为封建主义仍然是助长压迫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团体偏离了这样的解读，因为他们发现了政治上的缺口，并利用它们争取进步的事项。同时也出现了拒绝从纯粹阶级分析来看待问题的组织。处于菲律宾左翼中不同区域的LGBTQ行动者，社会化为不同的政治派系，这促进了运动中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 酷儿特质的现状

在这些竞争的声音中，酷儿理论可能有助于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运动中促进对话。一些LGBTQ组织倾向拒绝和其他组织对话，特别是当它们信念不一致时。这些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来自这样的逻辑，也就是意识形态差异是必要的、自然的、既定的。一些人甚至向我表示，由于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永远会排除对特定群体的正面看法，因此，尝试建立桥樑的努力经常失败。

我发现酷儿视角在这个脉络底下是一个可行的思维框架。我没有将政治派系直接视为矛盾，而是将它们的差异解释为历史产物。这种酷儿式的思考方式立基于它有能力培养对持不同意识形态行动者的同理心。需要注意，酷儿特质是一种战略性的行动过程。我们需要从对意识形态矛盾的理解转变为将其视为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调配出一种有助于这个当下的意识形态，而又不会在需要其他意识形态时感到窒碍难行。■

来信请寄至：

John Andrew G. Evangelista <jgevangelista@up.edu.ph>

> 对于菲律宾毒品战争的不同调叙述

Filomin C. Gutierrez, 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以及ISA偏差行为委员会(RC29)、女性、性别与社会委员会(RC32)成员

当 Rodrigo Duterte在2016年7月就职菲律宾总统时,一场针对毒品的战争立刻蔓延至菲律宾社会。此运动使菲律宾的国家警察哄骗吸毒者自愿投降并保证停止这种习惯,Duterte上任六个月后便有超过一百万的「毒瘾人格」投降。反毒品运动通常被称为「敲门劝导」行动(Oplan Tokhang),这是toktok和hangyo的合并词,在宿雾语中分别表示「敲打」和「恳求」。从2016年开始,tokhang已经成为执法当局或民间反毒义警执行法外处决(extra-judicial killing, EJK)的委婉说法。

毒品战争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引起人权团体的批评。根据官方报告,截止至2019年7月,约有5375名毒瘾人格在警察行动中被杀害。人权团体估计包括EJK在内的总死亡人数已超过25,000。国际刑事法院(ICC)在2018年2月开始针对Duterte涉及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社会气象站(SWS)在2019年末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5%菲律宾人认为许多侵犯人权行为是由敲门劝导行动所导致。

毒品战争引起了菲律宾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其中多数人都对人权观点十分敏感。官方、人权团体、包含社会研究者在内的专家,针对反非法毒品运动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有诸多辩论,也体现在具争议性的死亡人数估算、相互对立的毒品议题影响程度及严重性评估。

被捕者、被杀害者的寡妇,所遭遇的苦难,其叙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暴力的菲律宾现实背景。这个现实伴随着一个悖论:当前的政治和刑事司法体系高度污名化毒品使用,相对地,被捕者、媒体和多数群众却经常使用talamak(慢性的)一词来表达毒品的「正常扩散」。

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理解毒品嫌犯的不同调叙述,特别是涉及兴奋剂甲基苯丙胺(当地称为sha)的人。我访谈了27名狱中男性,大多是

工人阶级,且为早期和中晚期的成年人,他们在敲门劝导行动第一年被依毒品相关罪名逮捕。他们宣称自己被错误逮捕,警察放置了证据,并虐待或折磨他们以使他们认罪。他们形容自己面对强行抵达他们住所的警察时所面临的处境是walang kalaban-laban(无法防御)。尽管他们悲惨的个人处境,许多人仍然支持Duterte的反毒品运动,因为它代表着对日益恶化、长期被忽略的毒品情况,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很明显地,这些「毒品犯罪者」是2016年支持Duterte总统「刑法民粹主义(penal populist)」群众的一部分。日益增长的吸毒者和不安全的社区,所形成的道德恐慌,助长了刑法民粹主义的再起,这个术语由John Pratt提出,代表基于公众情感而非根据经验性证据或专家意见,而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这可以从SWS在2019年底公布的民意调查中观察到,Duterte在该调查获得了菲律宾人的72%净满意度,而对他发动毒品战争的净满意度则为70%。

在Duterte就职总统前,Gideon Lasco的研究便指出菲律宾港口社区的年轻人在非正规的工作(如摊贩、搬运工、性工作者)中,使用冰毒作为pampagilas(强化工作效能药物)。无独有偶,我的受访者也坦承使用冰毒来恢复体力、保持清醒,并从事难以完成或工时长且不稳定的工作(如卡车和吉普车司机、建筑工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成瘾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止,且不会让它成为一个恶习。他们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商品,而不是透过偷窃、抢劫或其他使冰毒在公共市场成为商品的犯罪行为。因此,对冰毒的使用范围分析,必须超越娱乐、退缩主义和成瘾的次文化理论等等范畴,并朝向它的功能,即作为应付贫穷和经济不稳定等压力的主流手段。

尽管受访者为自己的毒品使用辩解,我与他们交谈的结果却显示他们认知到冰毒是「家

「菲律宾的毒品议题不改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成瘾者与未成瘾者，或是好警察与坏警察之间的战争。」

庭破坏者」、「犯罪根源」、「终极邪恶」和「国家问题」，必须根除。他们叙述的一个关键面向，是被误导的警察错误地逮捕了他们，而非针对那些真正有罪的人：犯下令人发指罪行以延续其恶习的成瘾者、榨取他们的贪财贩运者，以及向成瘾者和小贩勒索金钱的腐败警察。

我和警察针对敲门劝导的初步访谈还表明，人权团体和媒体都错误理解了这种经验。他们谈到了他们的信念，即保护国家及其公民免受毒品威胁的使命和理想，「似乎还没结束」。尽管他们认知到毒品的确填补了贫困造成的真空，且毒品主在经济上剥削了成瘾者和贫困人口，但他们同时也视毒瘾人格为武装人员，随时准备以武力进行报复。更重要的是，他们反思性地回顾了敲门劝导行动，并认为这是一次揭露「毒品问题的真相」，以及它如何「严重破坏警察队伍」的运动。如果可以从「毒品犯」的视角讲述一个深入故事—Arlie Hochschild用来捕捉美国右翼共和党人经历的一种方法—它可能会与警察叙述的菲律宾现实截然不同。

关于菲律宾毒品战争的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助于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无论这些政策涉及的研究方法是量化成瘾水准、重新概念化毒品使用类型，或阐释公众对犯罪的看法。社会学面临的挑战是，必须谨慎对待二元的框架，这个框架将菲律宾的毒品问题简化成好人与坏人、成瘾者与未成瘾者、好警察与坏警察之间的斗争。更重要的是，研究毒品战争的社会学家必须对刑法菁英主义(penal elitism)保持警惕，这是一个Victor Shamma使用的术语，用来指过度重视科学或专家意见，并忽视被认为是情感、非理性或简化的公众。这样的自我反省要求社会学家，在面对公众时，无论是来自社会行为者团体内部，或是政治和道德光谱上对立阵营之间的竞争叙述，社会学家都能够坦然以对。■

来信请寄至：

Filomin C. Gutierrez <fcgutierrez@up.edu.ph>

> 让公共社会学 在菲律宾发挥作用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SMAG/CriDIS、鲁汶天主教大学(UC Louvain)、菲律宾大学宿雾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Cebu), 以及ISA政治学委员会(RC18)成员



2018年,宗教、科学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加入街头抗议,反对纪念戒严令。

在当前的Duterte政权统治下,成堆的尸体愈来愈多(《Rappler》,2018年12月)。具体而言,该政权已开始着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解决方案,借由一个封建政治家庭和买办构成的网路,在他背后提供支持并为他大胆的喉舌,还伴随着菲律宾警察和军事国家官僚体系。这点从Duterte如何在2018年召集菲律宾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并罢免首席大法官就表明了。

学者们称其为「威权民粹主义」,部分原因是,尽管牠公开呼吁将「谋杀」作为其反犯罪政策的一种策略,但牠却被誉为散布着受欢迎且发展有成的计划。然而,该政权继承了一种政治动能,这个形式是赤裸裸的威权主义。最近,牠增加了警力、军队和对菲律宾社区的准军事封锁,同时

牠通过选举欺诈、贪污、腐败来为其肮脏的政治扎根,并大肆屠杀,以仿照McCarthy的方式进行诱导,合理化谋杀社会运动者、宗教人士、人权倡议者、律师、教师、大学教授、农民、青年和其他人。

自从Marcos政权首次专政以来,菲律宾社会学的一项重大实践就是采用公共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对菲律宾公众而言形同隐形的一种必要回应。这是从以下观点而生的,即从Marcos政权到Duterte政权,菲律宾社会正面临永久专政的危机。它引起了人们的质疑:1986年第一次所谓的EDSA人民力量革命的本质为何?该革命虽然推翻了Marcos的独裁统治,但它又是否真的为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有鑑于33年后法西斯主义秩序的建立,现在似乎已能确

定,第一次EDSA人民力量革命缺少能够真正民主化的工具。这暗示着永久威权主义的危机,并挑战菲律宾宿雾社会学去重新思考人民力量革命以后的岁月,是真的在磨练全面民主转型,还是在复兴独裁统治。否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使过去的威权主义,以目前这种形式存活,并且还具备更大的杀伤力呢?因为,与Marcos的3,000多起杀人事件相比,近期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天就有33人被谋杀,也就是说,在Duterte政府执政的前三年,就有30,000多人被谋杀(《Rappler》,2018年12月)。

菲律宾大学宿雾分校所实践的公共社会学连结了:1.专业社会学,2.批判社会学,以及3.公共政策社会学。这可以和Burawoy(2004)的公共社会学对话,它立基于社会学劳动的四个分类,分别是:1.专业社会学,2.批判社会学,3.公共社会学(数个公民社会),以及4.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提供了社会学技巧的机制,也就是合适的研究设计,及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例如个案分析、社会志、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基本群众整合等。这使社会学家和学生都可以验证他们的理论,并参与有关社会及公共政策、社会机构、文化、团体、组织之间的对话,以及参与一起工作的人们彼此间的互动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它邀请社会科学家重新思考社会建构主义之外的社会问题,将菲律宾的公共对话延伸至街头,并提供机制以便记录及公布公众利益表达的模式。这站在原住民或地方政治的治理实践上,批判社会学在此使人们能够理解因某些有限资源而参与冲突的各团体,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批判社会学可用以衡量各种结构—无论是支配者或被支配者、控制的一方或被控制的一方。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群具批判性的菲律宾群众,可以被动员参加实际的公共示威活动,以组织一场社会运动。这场社会运动反过来成为最后一个环节的重要动能,以政策社会学的形式评估和判断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背景脉络。

前述论证错综复杂的编排方式,让较具体的技术结合成为可能,并使公共社会学得以在科学领域发挥作用。引进公共社会学的时机,是当民主化的动力使边缘化部门能够获得资源,并在公民社会和国家内部发挥重要作用时。它首先以社

会学的想像中的学术练习形式,作为学生和教授之间交流的切入点。接着,它延伸到教室的四面墙之外,形成一种社会工具,并成为一种机制,用以释放被压迫社区之间的沉默文化,具体作法是借由支持贫困的、匮乏的、被压迫的和受侵害的个体及社群中的组织,来达到广泛的讨论、理论化、社交工程。社会学家具备集结一股强大力量或一群人的能力,足以揭露国家直接地、暴力地充当一个保护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尤其是在今天的菲律宾,公共社会学家必须有胆量做民主化进程的先驱,因为菲律宾正面临着根深蒂固的民主匮乏及法治缺失。这次,诚如Marcos时期,菲律宾需要一个公民社会,且它的组成要是自组织的、志愿的、自行产生的、真正脱离国家的、能够阐明公共利益的、受法律秩序或一套规范所约束的。因此,公共社会学的终点可以被称为「公共示威社会学」。这个公共示威社会学的组成包括证据、游说工具、交易性和协作的机制、认知及理性的机器(也就是一群饱学的沟通者),以及/或是动员及竞争社会机器,并以一群公众或投票银行的形式出现。这种公共示威社会学衡量了正在使用的公共社会学到底多么有效率和有成效。示威活动中的公众是公共政策工具的一个提示,它是一个场域,用以评价及计算政府公共政策的绩效或失败。

公共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总结及理论化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Lascoumes和Le Galès,2007;《美国社会学家》,2005)。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实质的治理是在本地逻辑或社区集体共享和团结关系的框架内所进行。这个框架接着被纳入政府机构的决策、管理、税收产生和大众传播之中,但要经过公民社会及其公共示威的实质公开监督。■

来信请寄至:
Phoebe Zoe Maria U. Sanchez <phoebe.sanchez@uclouvain.be>

> 在菲律宾社会学 中「主流化」民答那峨岛

Mario Joyo Aguja, 民答那峨省立大学(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菲律宾社会学会主席, 以及ISA武装部队及冲突解决委员会(RC01)、老年社会学委员会(RC11)、城市及区域发展社会学委员会(RC21)、艺术社会学委员会(RC37)和灾害社会学委员会(RC39)成员



2019年于民答那峨岛, 菲律宾社会学会会议的参与者。
来源: 菲律宾社会学会。

经常被视为菲律宾南方的民答那峨岛, 在充满着边缘化叙述的国家历史上受到边缘化打击的影响最大。民答那峨岛在过去由玛京达瑙和苏禄两个苏丹国所领导, 且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 早在西班牙人于1521年到达以前便建立了中央集权体系及进步的文明。这些苏丹国与西班牙殖民者在惨痛的「摩洛战争」中作战了300年, 没有被殖民。美国在1898年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后, 民答那峨岛便突然成为了菲律宾的一部分, 从此被「合法殖民」至今。然而, 正是美国作为一股帝国势力, 才开启了民答那峨岛全面性的殖民工作, 导致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面临边缘化。这种针对民答那峨岛民的历史性不义, 被与主张分离主义的

摩洛团体, 其所经历的艰苦斗争连结在一起, 并解释了当前菲律宾南方糟糕的处境。这些针对民答那峨岛民的不公义作为, 直到今天都是转型正义的课题。

北方马尼拉(后来的马尼拉都会区)的崛起, 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 以及文化力量上皆是无庸置疑的核心, 并在国内维系了一个不公义的核心—周边关系。追求南方和平、政府去中心化以朝向更自主的经济及政治权力的努力, 仍然遥遥无期。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民答那峨岛的贫穷比例却很高, 且饱受分离主义的困扰, 伴随着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近期由菲律宾政府(GPH)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于2014

>>

年签署《邦萨摩洛全面协议》(CAB)，所带来的和平，依然伴随着极端暴力主义的威胁，强化了民答那峨岛在菲律宾国家中的边缘地位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及对象。

> 菲律宾社会学社群的中心主义叙述

国家对于核心—周边关系 (center-periphery) 的叙事使国内不同领域的努力受到困扰，包括学术、科学和专业的叙述。菲律宾社会学学会 (PSS) 就是这种叙述的典范。菲律宾的社会学发展主要是由大都会作为核心发动。它的成员及领导地位由来自核心的社会学家所主导。它的出版物《菲律宾社会学评论》主要收录核心感兴趣的主题和作者。它的会议大多在核心举行。但，最近这种趋势正在改变。

组成PSS的人大多来自核心，且所属大学具备社会学专业课程。章程会员的名单和它们机构间的隶属关系反映了这点。当PSS于1952年成立时，它的章程会员分别隶属于以下机构：德拉萨大学、菲律宾女子大学、菲律宾乡村基督徒团契、东方大学、圣灵学院、联合神学院，以及菲律宾大学，都来自马尼拉都会区。

于是，PSS的领导权由大都会所领导。在它69年的历史中，它的主席有54次由马尼拉都会区担任，其余7次是吕宋岛，以及民答那峨岛8次。维萨亚斯群岛未曾取得过组织的领导权。光是菲律宾大学和马尼拉亚典耀大学相互竞争组织的领导长达43年，而整个民答那峨岛却只领导了8年，也就是10.29%。上一次它担任该职位是在1980年代。直到2019年和2020年，它才终于有机会领导，并将强烈的民答那峨岛观点带入全国的社会学论述中。

> 变化中的任务

从2000年代开始，PSS在民答那峨岛开始了许多行动。这是顺应时代的回应，但也是因为民答那峨岛人终于成为领导层的一份子。这成了一个绝佳机会，让PSS不仅可以带会员前往民答那峨岛，还可以使它的会员熟悉民答那峨岛论述作为国族叙事时的一部分。尽管有安全疑虑，2014年PSS会议还是在民答那峨岛最南端的三投斯

将军市成功举行，主题是「危机、复原力、社区：灾难时代的社会学」。PSS还不满足，再次在民答那峨岛北部的伊利甘举办了主题为「和平与冲突的社会学：脉络及挑战」的2015年大会，某种程度是该组织的「转型正义」。该主题盘点菲律宾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在2014年签署《邦萨摩洛全面协定》时的承诺，以及44名菲律宾特别行动部队成员死亡的马马萨帕诺冲突。随着民粹主义和Rodrigo Duterte于2016年兴起并取得权力，而他同时也是第一位来自民答那峨岛的菲律宾总统，PSS便在他的城市纳卯市举行会议，主题是「想像中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社会中权力及知识的转型」。2017年及2018年会议在维萨亚斯群岛举行，直到2019年回到民答那峨岛的布基农省，主题为「参与的公民与身份认同」。

在民答那峨岛进行的会议，给了当地提供社会学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主持的机会，并规划他们成为国族叙事中，训练新社会学家的一部分。民答那峨省立大学(MSU)在三投斯将军市主持了2014年会议，紧接着是2015年的MSU、伊利甘理工学院和2016年的达沃亚典耀大学。棉兰老中央大学(CMU)和布基农省立大学主持了2019年的PSS大会。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民答那峨岛人而言，这成为一个机会，可以利用此平台展示研究成果、发展友情，并成为PSS朝真正的国族社会学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今日，菲律宾社会学家对民答那峨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民答那峨岛的民众、场所、文化渊源及论述。民答那峨岛已经开始打破大都会的霸权，并将自身主流化为「另一个菲律宾」，有资格具备批判性社会学论述及领导。随着近年在民答那峨岛上的辛劳工作，菲律宾社会学学会在使菲律宾社会学成为真正的国族社会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信请寄至：

Mario J. Aguja <mario.aguja@msugensan.edu.ph>

> 流行病下的全球社会学

Geoffrey Pleyer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比利时, ISA副研究主席, ISA宗教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前会长(RC47), ISA宗教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委员(RC22), 青年社会学(RC34), 社会运动, 集体行动与社会变迁(RC48)

COVID-19流行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道德、政治危机, 对于全球社会学的呼告。
来源: 创用CC。



冠状病毒将科学带回公共领域的中心, 就算在民粹主义领导者曾企图消减科学合法性的那些国家中也是如此。流行病学家、医生与生物学家为我们带来确定的事实: 这次的疫情每天都在进化中, 比「严重的流感」还要严重。社会科学家同样提出不容置疑的事实: 尽管病毒本身可能感染我们身边的任何人, 但我们在面对它时却极不平等。当涉及病毒的致命后果时, 公共卫生政策与社会不平等跟我们身体对病毒的反应同等重要。社会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 COVID-19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卫生危机, 这也是社会、生态与政治危机。

这次的疫情造成「去全球化」的趋势, 各国关闭国界, 旅行次数急剧降低, 重大的国际活动(例如ISA论坛)取消或推迟。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本国人」能够获得医疗设备与基本用品。社会科学经常沿着这条路走, 并侧重以国家为范畴进行的国家统计研究, 分析该病毒在各国各阶级与种族间不同的影响, 并监督政府对危机的反应, 参与全国性的公共讨论。

COVID-19大流行是一种深层的全球现象, 方法论民族主义捲土重来其实是一个悖论, 并不仅仅是关闭国界的问题, 也显示出我们之间相互依

赖的程度有多深。面对疫情,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医学或自然科学领域, 对病毒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改善医学治疗并研发出疫苗是常态。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 我们需学习其他国家、或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这种全球视野不应该侷限在“方法论全球主义”, 也不应侷限在宏观的分析。为能够疫情时期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要促进全球不同地区的社会科学家间的对话, 使其融入地方、国家、区域与全球的现实处境。

尽管政治决策者时常将其排除在外, 社会科学在应对Coronavirus大流行的贡献

>>

与硬科学一样重要，并在许多方面与硬科学互补。这几项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面向的讨论上。

1. 疫情是一种社会危机

社会科学家表示，尽管病毒可能感染每个人，但流行病对我们的影响都不同，而且病毒的治疗方式与社会因素紧密相关。COVID-19疫情大流行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并显现出社会结构的问题，尤其是在阶级、种族与性别。一个交叉检视的方法对理解如何经历危机，以及我们面对危机的方式为什么不平等且不公平非常重要。在没有健康福利制度的国家或贫民窟，日益激烈的竞争如果国家与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法照常运作，卫生危机将迅速转变成人道危机，并带来致命的后果。

2. COVID-19的治理

第二部份的贡献在于分析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制度应对疫情的方式。国家已经将自己作为负责处理疫情的主要行动者。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与欧盟在全球危机中则消失了。因此，这次的疫情显现出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势与侷限。国家政府效率低落或国家领导人嘲讽疫情并推延封锁措施的反复论述，导致数百人死亡。面对流行病，各国政府都设定自己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大多数国家没能提供基本的保护措施，来防止病毒传播给医护人员。透过他们的政策，政府为某些人提供更多机会来抵抗这种病毒，而死于养老院的人却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公共统计数据中。

流行病与封锁彻底改变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国民向国家政府求助，期许提供对流行病的保护、照护与因应措施。许多人也因此接受国家加强的社会控制、新的监视技术与脸部识别做为控制流行病的代价。

3. 社会如何回应？

第三部份的讨论针对个人与公民社会处理危机的方式。社会学家研究封锁对人民生活、主观性与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发现世代关系有了新的型态与意义。数位科技在维持社会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社会隔离措施使社会团结处在危险中，并经常缩减社区互动的范围。虽然在社区与城市中出现新的团结网路，但我们也看到这次疫情对封闭社群或家庭带来团结的侷限性。

4. 在危机过后，会有新世界的崛起吗？

第四部份分析了疫情的长期影响。作为全球危机，COVID-19疫情开展了各种可能性，也是一个以不同方式重塑这个世界的机会。许多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对人类、照护与社会不平等更加敏感的社会，并建立更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然而，这场危机也可能为其他社会模式铺路。迄今为止，在管理危机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战胜新的团结。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的重点是拯救国家公司，而非加强公

共医疗服务。流行病也可能会为新威权时代铺路，生命政治作为新技术的基础。

人类克服COVID-19大流行的方式将取决于医学与科学，尤其是寻找疫苗，也端视社会、决策者与公民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并播下世界新希望种子。■

来信请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COVID-19: 当前流行病 的第一课

Klaus Dörre, University of Jena, 德国



这场疾病的流行狠狠地打击了小型企业，包含餐厅与小贩。

来源：Russ Loar/flickr.com.

保留部分权利。

49

在我撰写本文时（2020年4月），经济正逐渐衰退。没有人能够对未来几个月的情势发展做出精确的预测，因为还不确定流行病会持续多久。但是，经济将预估会出现严重下滑，唯一的问题是衰退将有多严重。

> 经济发展与其劳动力的影响

最佳的情况是多数国家的封锁将会在一个月后就结束。然而，如德国，都需要担心会像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出现的经济负成长。根据ifo经

济研究院的数据，停工三个月可能导致高达20%的衰退，其中「短工时」的人数可能多达550万人（德语为Kurzarbeit，其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不会遭解雇，但工时可能降至0小时，而政府则补偿他们部分的补偿。）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财政援助，许多中小型企业将无法长期生存。对经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这将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对像德国这种世界出口冠军的国家而言，流行病结束后是否会出现快速经济成长难以确定。这将取决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或欧洲邻国）的恢复速度。然而，德国联邦政府的

行动是自相矛盾的：它应对欧盟内部的快速援助感兴趣，但却阻止欧元债卷作为危机管理的一种手段。

有很多事情需要担心，因为这场危机没有好事。它正威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暂时性剥夺数十亿人的重要基本权利。随着流行病时间越长，对文化、社会或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就越严重。因此，大小公司都适用：不要裁员，但最好是有补贴的临时裁员。总体来说，保障就业很重要。在德国，有一些经过检验与尝试的长期短工时措施。

>>

生产过程取决于合作，包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许多人而言，工作中的社交关系很重要。当员工间的化学反应良好，即使是对身体较严苛的单调工作也较能够容忍。但现在已经消失了。「保持距离！」基本上就是彻底的去社会化甚至去社群化。

另一方面，目前与医院、超级市场、疗养院、农业等有关系的工作都很难完全避免身体接触。例如，人们能够遵守规定并使用塑胶玻璃来保护店员，对那些无法在家工作的人，对于健康的风险是不成比例的大。这就是为什么公车司机、结帐人员、护理人员与护士越来越受客户与大众感谢的原因。我们只能希望只能希望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并期许未来这些领域能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薪资、更多人力分担工作与更好的工作条件。无论如何，最能够撑过危机的国家将会是那些拥有健全医疗体系且能够应对危机的福利国家。这也清楚显示，欧洲大陆上哪几个国家受此危机后果的影响最大，那就是南部与东南部那几个国家。西班牙与义大利受武汉肺炎病毒感染者的高死亡率也与欧洲紧缩政策迫使他们削减卫生部门有关。

> 一个更脆弱的民主？

美国现在是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主要地方。激进右派自然是在试图善用这种情况。各种阴谋论在网路上

流传。那群相信他们的人不仅危害自身健康的风险，更会危害他人的风险。但人们会发现，只要川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或波索纳洛等右翼激进分子掌权，危机管理就会彻底失败。因此，我认为，这场危机将导致右翼民粹主义者与激进分子的惨败。

相反地，在民主进程方面存在另一个隐忧：气候变迁可能带来许多外部冲击，这也需要大规模的危机管理。因为，我们需要小心，不要使紧急状态变成常态。民主需要公开讨论、辩论、示威与罢工。尽管存在着危机，但这种基本权利需要得到永久的保障。

> 必要的改变

Covid-19疫情后，这个世界与工作型态将会大不同。近几十年来视为毫无争议的经济政策教义已经被推翻：债务上限已是过时的做法。公共债务取代了过去「黑零」(black zero)政策的地位，成为平衡政府预算的主流。经济典范也将在Covid-19疫情之后持续转变。人们还是想知道怎么解释这一事实，即十年来第二次必须透过非市场经济的方式来拯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未来不可能将此事件视为黑天鹅而不予理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更加容易决定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尽管没有德甲足球比赛，我还是能够过上完美生活。但我们离不开面包师傅、农民、医疗人、货车司机或乐于助人的邻居。这显示出我们都需要

一个良好运转的社会基础设施。这必须成为资金充裕的公共财。如果将职业足球员Jadon Sancho与护士的月收入进行比较，就能够清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事是不对的。社会服务需要在财务上进行升级，而且需要在认可范围内进行。

关于气候变迁造成的挑战，危机是由灾难造成的(经济)衰退。如同2009的金融危机，当时破坏气候的排放量与资源的耗损都减少了。由于这场危机，德国可能最终能实现自身的气候目标。但是，这绝对与我们迫切需要的可延续性革命无关。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清楚地发现，国家在危急时期都是有自信的。国家透过强制性规定限制我们的自由来造福所有人！但如上述所言，国家行动服从民主决策。自由是有着具约束力的社会意义，这也适用在企业家的自由。未来，各种自由将需要严格地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总体而言，比不开休旅车更好的就是不生产它！比不出口军事装备更好的就是不生产它！这两个例子清楚表明：在危机后，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经济秩序进行根本性的辩论，而这场辩论绝不能仅由经济学家与职业政治家进行。■

来信请寄至：

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 后疫情世界的社会学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与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 (2018-22)



由于COVID-19，世界以及社会学理论／分析正受到改变。
来源：创用CC。

度起头，再逐渐向内聚焦的。例如，社会不平等被理解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全球性剥削现象，能够透过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向内追溯。因此，多数社会科学家呼吁处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结构，以便适当解决受影响的（抽象）社会阶层的苦难。

与此相反的是认同政治运动（即伊斯兰运动、极右派运动与保守运动），他们把关系视为由近端开始，最后发展至遥远的地方。他们重视社区工作与家庭邻里关系。例如，川普支持者相信川普有能力解决被遗忘的美国白人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黎巴嫩的基础信仰组织目前是最积极主动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在封锁时期失去工作的家庭。就其他认同政治运动（围绕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而言，他们的斗争可能因情势而有很大的差异，但往往以普遍主义人权的概念来支持特定社群的斗争。然而，对Richard Rorty而言，在推进多元文化议程的同时，这种“左派文化”为争取社会阶级正义所做的斗争有时非常微不足道（例如美国）。>>

COVID-19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暴露出人与人之间、国家间、公民与政府之间间的信任断层；疫情促使我们对自己、社会关系与总体生活提出疑问。这场危机不限于公共与环境健康、或经济。我们目睹的是晚期现代性危机与其全面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时刻。克服这场危机后，我们依旧无法轻易恢复到「一切照旧」的状态，社会科学应努力分析并致力解决这些新的现实状态。

全球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学将会呈现什么样貌呢？在此，我想强调社会学的三项任务：

建立社区到人类的多层面关注；积极应对人类世（Anthropocene）与资本世（Capitalocene）的问题；最后，为承认与道德义务设立好的议程。

> 由社区至人类的多层面关注

首先，根据疫情状态能够非常清楚检视各国间的实质联系，将全球的形象由隐喻转为现实。但是，我们仍需要促成更多全球团结与人文主义全球化。要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将更多面向概念化。Gilles Deleuze认为，多数左派（包含多数社会科学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从较为宏观、遥远的角

我将Covid-19后的社会学视为一种能够重塑社会学传统如何掌握其研究焦点的方法（从外而内或从内而外），从而创造出多尺度焦点的方法：重新思考家庭、社区的重要性，以及爱、待客之道与照护的道德规范，然后扩大到民族国家与整个人类世界的层面。

> 在人类世／资本世中挣扎

COVID-19不仅是全球化的疾病，更是人类世的疾病。人类消费主义的教条正在消耗地球无法更新的资源，COVID-19只是这种消费主义的一个事件（尽管很重要）。众所皆知，COVID-19是透过食用非饲养动物（如麝香猫，穿山甲和蝙蝠）传播给人类的。他们真的好吃吗？布迪厄认为这是与众不同的标志，他指出我们中下阶层消费大量不必要的豪华物品。在这里，对许多黎巴嫩人而言，放假成为出国旅行的代名词。

法国社会学家Rigas Arvanitis将这种疯狂的消费主义称为「获得幸福的神话」，认为这最终将促使更多健康问题、流行病、死亡与灾难发生。如果不重新连结个人、社会与大自然，就无法检验这种多面向的关系。例如，要解决气候变化与政治经济体制，就必须提升对于人与地球之间关系的公众意识。Jason Moore提出“资本世”的概念，作为对人类世的敏感性进行一种批判性挑衅。对他而言，资本主义正在将整个自然界组织起来：世界生态与资本累积、权力的追求与自然界的联合生产，以连续的历史型态结合在一起。

这种多尺度的研究取径要求将经济与社会重新连接，并将

其与政治跟文化连接。因此，我们需要复兴Karl Polanyi的社会镶嵌概念。Polanyi介绍了三种将社会融入经济的形式：交换、再分配与互惠。由于市场（交易场所）需要被道德化，我们的社会科学应该要认真地重新思考这三个概念，这包括对所有形式的投机活动建立牢固的社会控制。如果没有采取重大措施来防止财富集中在每个领域的少数公司中，如果没有对高资本额与财富建立沉重的税收，也没有转向缓慢成长的经济与相应的结果（例如，需要廉价却低碳的公共交通，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非债务，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就无法进行再分配）。我将在本文的下一部份讨论互惠的内容。

我们意识到，为环境而进行的斗争离不开我们选择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我们期望的经济体制的本质，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过。美国前总统雷根清楚地描述了这个快速增长的危机，他说「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成长，因为人类的智慧、想像力与好奇心无限」。在上一期的《[Global Dialogue](#)》中，James Galbraith与Klaus Dörre提出，增长确实存在侷限性，并描绘出一种具有意识的、缓慢增长的新经济，他将经济学的生物物理基础纳入其运作机制中。

> 承认与道德义务的政治

现在我来谈谈Polanyi社会镶嵌有关互惠性的问题。Polanyi将其定义做为长期关系的一部份，商品或服务

的相互交换，其中互惠、道德义务与关怀被增添到契约关系中。互惠建立在一种群体或网路间相互接受彼此认同的肯认政治之上，这与多元论者与多元主义的典范相符。互惠的运作取决于社会关系中道德义务的强弱，强而有力的社会关系可以在Mark Granovetter 提出团结的网路，他认为有时牢固的网路关系是基于礼物交换的关系。与此相关并在此基础上扩展的是Alain Caillé的观点，他提出反功利主义的假设，即人类渴望被视为奉献者意味着我们的关系不仅是出于利益，而是在于享乐、道德义务与自发性。

唯有在乌托邦的存在下——即便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乌托邦——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学才能在其指引下具有意义。没有乌托邦，就不会有道德生活，传教与社会学家乌托邦间的区隔为，后者不一定谴责他人的反乌托邦理想，甚至可能寻求相信乌托邦的人一起工作。因此，于这样的社会学中，我们更应该理解、深化牟斯式的「礼物关系」，并更加重视社会科学与道德哲学相连结的道德义务。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已经促使人们采取新的策略来加强剥削、剥夺与新自由资本主义，并扩大我们的贪婪与自私自利，但这也使我们有机会探索并提供新的方式来理解或恢复我们的社会正义与人性。■

來信請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孟加拉的 性别化都市空间

Lutfun Nahar Lata, 澳洲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SA都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RC21)成员



Sattola贫民窟的女人在贫民窟里卖蔬菜。

来源: Lutfun Nahar Lata。

在 发展最快速的巨型都市中，穷人的生存是难以受到支持的。对南方的都市而言，「非正式性(informality)」是其经济活动中很大的一部分，其指的是一些不被制度承认的居住或劳动行为。在这些都市中，穷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为非正式部门，也因此其劳动行为时常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事实上，多数的南方都市中有60~80%的工作机会都属于非正式经济，甚至有些高达90%。达卡作为南方巨型都市之一，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除了从事服装行业和其他低薪工作外，多数达卡的贫民窟居民都没办法取的正式的工作机会。现有的研究显示，达卡大部分的政策与发展策略，皆是以房地产或是基础开发为核心，对于居住与就业需求少有关关注；这也使得穷人以非正式部门作为维持生计的主要选择。然而这些非正式的劳动者，在为了生存而使用达卡的公共空间时，面临了许多挑战。

非正式性为穷人获取收入带来了许多限制，其中一项便是取得使用公共空间以进行商业活动的权利，就算是自己的居住地点附近也一样。关于这类主题的研究遍及全球，并且皆指出，使用公共空间对于全球南方都市中的穷人来说，是攸关其生存的。在多数南方都市中，穷人数量呈现持续增长，即便如此，都市计划与政策实践中并没有为其留下生存的空间。此外，由于城乡人口流动，都市人口持续增长，再加上房地产的开发，土地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因此，使用／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将是未来巨型都市生存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都市中的不同行动者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需求与慾望，其支配空间的权力却也有所不同；因此，都市的空间事实上是被社会所建构。由于占用公共空间销售产品在达卡是非法的，城市贫民经常被赶出公共空间，这侵犯了他们的生存

安危，也侵犯了其对于城市的权利。另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则是空间使用的性别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频繁地进入和使用都市公共空间，过去「男人在外—女人在内」的空间结构被打破，空间与性别的论述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达卡，贫穷女性参与非正式经济，对于贫民窟家庭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份收入通常不足以维持家庭。然而对女性来说，使用公共空间获取收入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女性能否进入公共空间取决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宗教习俗以及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性别职业角色；她们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往往受到限制，因为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仍然把女性视为应该待在家中的。

多数南亚的研究以贫穷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为主，关于女性利用公共空间取得生存所需的研究则较少。我在达卡的Sattola贫民窟以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并关注使用都市公共空间以维持生存的性别面向；田野调查为期4个月，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间，采访共计94名非正式劳动者，包含18名女性与76名男性。我的研究结果说明了社会污名、宗教困境和父权制度的三重困境，如何使女性在透过公共空间取得收入时受到限制。

我的研究显示，由于穆斯林的宗教常规会限制女性的衣着、行动和工作，大部分 Sattola 的女性并没有参与任何具收入的活动。除此之外，参与于户外的经济活动也被视为是极端贫穷的指标。由于上述的现象，约只有3%的农村女性从事有薪工作，农村男子则有24%；女性在有偿的非农业部门参与率为18%。女性的支薪劳动不如其在家务上的生殖、照顾等角色受重视。如果女性或老年女性打破这样的性别界线，试图出门赚钱，就会面临性骚扰或口头骚扰，甚至是其他类型的骚扰和暴力对待。由于他们破坏了社会规范，男人会说她们品行不端。即便她们只是在自己生活居所的一旁，进行卖东西的日常活动，多数曾经参与非正式交易活动的受访者仍然表示，自己曾经历过这类情况。如一位受访者就表示：「因为我是会做生意的女人，很多人会说我坏话。虽然被这样说，我还是要继续经营店家来教育我的小孩。」另一个受访者也提到：「我卖茶叶的时候，有些男人会刻意激怒我。他们有时候还会碰我的身体骚扰我。」有些女性并不会理会别人的指指点点，因为他们已经穷到没有余力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如一位卖水煮蛋的受访者所述：「不同

人有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反正我就是不在意这个。」贫穷的女性会在街上进行生意活动，时常是因为她们没有其他谋生的选择。举Moyna的情况为例，由于她的丈夫生病不能工作、儿子吸毒，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她也只得一个人经营生意；孟加拉医学研究委员会(BMRC)的官员把她们一家人赶出了委员会附近的人行道，她才开始在达卡的Sattola贫民窟的大街上卖东西。

在研究中，我进一步指出，许多女性曾遇上严重的性骚扰。女性在特定区域徘徊、试图卖出商品时，男性可能会以对待性工作者的方式对待他们。也因此，大部分女性受访者在贫民窟外卖东西时，会由哥哥、邻居、老公或小孩陪伴。举例来说，在刚开始卖花时，Tahera的邻居Noakhali便会陪着她，以防她受到其他男人的言语或行为骚扰。人们常说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会赋予她们权力，但对于达卡最贫穷的女性来说，这大概只是一个神话，因为她们的(身体)安全仍然依赖于男性陪伴者。

孟加拉在2017年度全球性别落差报告中，在144个国家之间挤身于第47名。孟加拉政府以此为荣，也以改善乡村贫穷女性的生存情况为重点，并提供她们有助于改善收入的相关培训。至今以来，随着女性逐渐意识到自身相较于男性处于较为次等的位置，孟加拉的政府与民间组织也开始强调女性的「战略性别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政府与民间组织也试图借由提供小型贷款来满足女性的劳动参与需求，并实现「实务性别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实务性别利益」并非是推动女性解放这类长期目标的行动，而是针对女性身处特定环境、面对其社会角色时所产生需求的立即回应。改善都市女性的劳动条件，并提供其他如日托中心的设施，对于促进女性参与劳动来说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有实际行动来确保女性的人身安全，主动打造一个安全的城市。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无法确保女性在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那么至今他们为赋予女性权力而设立的所有规范与条例、所有付出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来信请寄至：

Lutfun Nahar Lata <l.lata@uq.edu.au>

> 劳工国际主义 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Raquel Varela, 新大学, 里斯本



摄影: Nick Bastian/flickr.com.
保留部分权利。

2016年的夏季,来自美国的汽车零件跨国供应商杜拉汽车(Dura Automotive)与克莱斯勒(Chrysler)、奥迪(Audi)和BMW等汽车制造业者缔结合作关系,承诺供给这些企业汽车零组件。随着订单的增长,若工人们不接受在周末超时赶单,杜拉将因无法如期交货而面临巨额罚金。

在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居中协调下,众多工人为此向法院提出异议。法庭也前所未有地宣判决杜拉公司的此番操作是合法的,因为杜拉德国厂在周间是由德籍工人生产,而周末才是葡籍工人。根据访谈资料,一名葡籍工人表示,当他们抵达厂区时,可以感受到周遭紧绷的氛围,也有部分器械早已被当地工人破坏。

> 欧洲劳动环境的重塑:位于风暴核心的移工

在当代资本社会里,工人们被迫化身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除了得在部门间竞争,更同时也在国内、甚至国际的劳动市场竞相贩售自己的劳动力。讨论跨国移工议题时,我们必须认知到这连结到实质薪资与工作权两个客观条件之上。当今的欧洲政坛,并没有一个为跨国移工阶级的利益发声的强力政党,使得相关议题在政策面向的讨论里往往失焦,沦为民族主义者的禁脔。若不是被极右派的种族主义与禁制主义主张给左右,便是被劳动解放运动的倡议者(自由党、保守党及社会民主党)给代言,有些时候也会有被社会权的讨论给分食的情形。仍未有基进的国际主义政治主张在欧洲社会讨论移工议题时发

挥实质影响力。欧洲各邦的移民政策还是以强制性的劳动力管理为主,而非基于人道考量或多元文化关怀。当愿意为体制内的弱势争取权利的既得利益者与社会底层的群众未能建立起显着有效的社会连带时,种族主义或排外的主张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滋长。

全球化创造出一种全球各地的劳动阶级以低工资竞逐工作机会的现象,而这或许同时也形塑出作为价值对立面的国际主义得以立足的条件。如果针对卡加雷多分部工人的调度能够为杜拉解决德国的罢工问题,那么整个欧洲的码头工人也能在付出极小代价的情况下罢工,为葡萄牙的码头工人在与资方的角力中取得胜利。

> 为下一场跨国界罢工储备能量

有14萬會員的國際碼頭工人連線(The Inter有14万会员的国际码头工人连线(The International Dockers Union,简称IDF)二十年前在英国利物浦成立。1995年的9月29日,有500名签订不定期劳动契约的利物浦码头工人由于拒绝越过由50名非典型劳动者拉起的纠察线,而被默西码头港务公司(Mersey Docks and Harbour Company,简称MDHC)全数解雇,因而掀起一场由1995年延烧至1998年的全球性劳权争论。

这场「利物浦大论辩」(The Liverpool dispute)可以被视为欧洲工人对抗新自由主义的首次国际主义运动,这在当时实属罕见的创

举。也只有在这样的紧张情势中，劳雇关系不稳定的非典型劳动者及受聘情形相对受保障的工人团体，才有机会集结并成功动员，共同为彼此的权益发声。同样的策略与概念，也造就2013年安东尼欧·马利亚诺(António Mariano)在里斯本被选为连线的领导人，他是声援利物浦工人团体的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葡籍码头工人。起初，加入国际码头工人连线被标志为参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起手势，这被视为突破国际外交情势、促成不同国家间劳工团结的机会——以国家为单位的劳工组织在国际间的合作上常无法发挥理想上的作用。因为只有有稳定办理会议、拥有众多在地与全球会员的国际码头工人有能力策动国际或区域层级的罢工行动。

在2013到2016年间，连线也发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与抗争，力求针对过去在里斯本港工作的非典型劳工提供就业保障，并反对欧盟三巨头(the Troika，指欧盟执委会、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在葡萄牙财政危机期间要求下所制定、将港区人力派遣的委外统包作业市场化及自由化的法规。

2012年的8月1日，葡萄牙政府发布一条劳工法规的修正案，当中否决了劳资集体协商的法律效力，也公告将调整劳资间的法定关系，并解除任用临时工的限制、取消任聘专业认证人力的规范、放宽工时限制、将最低时薪由1700欧元调降至550欧元，最后，也针对解聘条件予以宽限。连线的领导人相当清楚明了地提出对策：他们将动用正聘劳工的罢工基金资助这次修法后被解聘的非典型劳工，并游说国际码头工人代表会(International Dockworkers Council，简称IDC)酝酿于2014年2月在欧洲各国发起罢工行动。

2014年的2月4日，在IDC的发难下，欧洲各港口开始罢工行动，使所有码头工人了解在里斯本发生的事情。在这期间，在所有响应这次行动的港口，码头作业全数停工，以展现国际码头工人的团结。这场两小时的罢工最终为里斯本港的工人迎来曙光，葡萄牙当局承诺修法后被革职的47为非典型劳工将得以复职，部分劳工甚至得到比先前更佳的待遇。就我们所知，这次国际串联的罢工行动以及2018年6月瑞安航空(Ryanair)于欧洲各国的罢工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少数展现整个欧洲工人团结的国际行动。在其他案例中，以各国国内劳工连线为单位的国族论调则更为风行。

我认为，杜拉的抗争行动及里斯本码头工人的胜利使得工会及其内部政治、权力分配的革新而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样的结论并非不证自明。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历史因素造就劳工行动在不同地方有国际主义思维与国族主义意识的分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会需要深入个案来分析它们个别牵涉的条件。

> 团结起来：不只是纸上谈兵

全球化创造了一种跨国生产的模式，这使得我们以从未有过的形式依赖着其他国家。19世纪时，如果一座工厂老板希望平息罢工，他将会雇用一些在地的武装佣兵作为私人警力。但其实在当时，不只是平定罢工会在地方层次处理，所有涉及日常生产的种种(涵盖原物料、工人、零组件、维修保养)，都在同个工厂的厂区内或邻近地区完成。然而今非昔比，当代的货轮可能由美国的大学设计，以西班牙产的钢铁、来自芬兰的引擎、以及德国的漆墨涂装，并在南韩建造。

里斯本的码头工人人们在修法后及时领悟到这些年轻的临时工所处的非典型劳动体制恐怕是短期内将引爆的定时炸弹，并同时意识到对集结后的劳动群体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当今的复杂社会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以一种链状的型态运作。要在特定的时间点打断这样的供应链可以重创所有的生产工作。一整个国家的运作可能因而停摆，所有生产工作的命脉得以从中撼动。不只是运输工人拥有这样的力量。医师、教师、公务人员及法官，都拥有同等的力量。

随着全世界「工人自决」的声势不断地提高，也凸显了正视多元化的需求的重要性，并提醒参与者以巨观的角度看待社会运动的整体可能态势。资本积累的动态分析及国际市场上针对国界的策略性操作，应当使我们发展出一套真正属于国际主义的方法论。这样的国际主义观点需要奠基于劳工独立于资方的独立结社。”Verba non sufficiunt ubi opus est factum.”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来信请寄至：

Raquel Varela <raquel_cardeira_varela@yahoo.co.uk>

> 葡萄牙面临极右派的威胁

Elísio Estanque,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ISA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成员 (RC47)



2012年里斯本“三驾马车”时期的示威抗议。
摄影:Elísio Estanque

as Mudde在其2017年《欧洲极端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激进右派民粹政党的主要斗争为突显「他们的」议题,例如贪污腐败、移民议题与国家安全。极右派民粹主义透过否定一个人群中不同利益的存在,透过强调一个单一、本质主义的「人民」的概念,来挑战腐败的菁英,导向一个摩尼教式、两极分化的政治文化观点。他们也会动员选民来反对政治菁英,指责他们未能阻止由「他者」、「陌生人」、「黑人」、「吉普赛人」所代表的外部「威胁」。在工业劳动力下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再能够主张经济上独特利益的承认,这可能会引发工人阶级的怨恨情绪。正如 Klaus Dörre (2019) 所言,这种针对特定阶级的经历可能会成为“形成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材料”。

葡萄牙迄今为止都没有出现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运动,在欧洲被视为罕见的案例,但这个状况可能会改变。我指出三个重要的社会学面向,

这些面向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本质:长期的独裁统治历史;1974年4月激进的民主革命;随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而来的阶级结构重组。

> 历史背景

1933年整合保守主义的“Estado Novo”政权正式成立,该政权的起源能够追溯至1926年的军事政变,借由1910年君主专制政权倒台,引发基层工人阶级运动,是该政权主要的攻击目标。在天主教會的掩盖下,1920年代共和党员、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对旧特权阶级寻求报复攻击,Salazar的道德观念使葡萄牙在教育、文化、经济与工业上更加落后,并惩罚、迫害、逮捕与折磨反对派长达四十年之久。尽管实行镇压手段与审查制度,在70年代初期还是出现一些罢工行动,该行动逐渐巩固地下的工会组织,这主要跟葡萄牙共产党以及与教会有联系的一些进步派的影响所致。此外,非洲殖民战争与1960

年代学生在里斯本、波图与孔布拉市的抗议活动，这两个行动深受国外风气的影响，增加不满情绪（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是战争的第一批受害者），这有助于扩散希望为国内民主带来火花。

1974年4月25日，由一群拒绝继续战争并为民主与国家而战的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不过，下一阶段的全民动员（如罢工与佔领、意识形态辩论与更严重的政治分裂），正是民主得以成长的养分。即便如此，这个形塑民主与公民的过程，仍是充满争斗、空想与冲突的；其中“社会主义”处在争议核心，而拒绝“法西斯主义”是主要统合要素。反法西斯的联合并不能够避免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结构性仇恨，要一直持续至2015年，直到被称为geringonça的联盟出现后，双方之间的仇恨才结束。

> 侵蚀民主

葡萄牙擁有46年的民主制度，加入歐盟35年，葡萄牙擁有46年的民主制度，加入歐盟35年，显现出重大的社会与体制进步。在政治领域中，政府始终受到议会多数支持，在中偏右派（PSD and CDS）与中偏左派（PS）政党之间摇摆。议会右派基本上由CDS所代表（基督教民主派所启发的社会与民主中心）。1970年，该党在选举席次拿下16%（在该党创始人Freitas do Amaral的领导下，最后几年与社会党进行接触），但该党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目前为4.25%。

时至近日，关于萨拉查主义与仇外行为最激进的讨论仍侷限在非常小的群体：PNR（全国复兴党），成立于2000年（整并了小规模激进群体），从未超过0.2%的投票率，甚至被以暴力、仇外心态与非法拥有武器等理由向法院起诉；以及成立于2014年的新社会秩序组织（New Social Order），由PNR异议人士Mário Machado领导，其此前曾因仇外暴力被定罪。2019年8月，先前宣布为「葡萄牙最大的民族主义活动」的一场会议聚集数十人，其中包含欧洲新西斯主义政党的代表。数百位社会运动者在举行会议的饭店门口向此会议进行示威。

大家都知道欧盟的政治计划对葡萄牙产生正面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已经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货币联盟的方向屈服了。这对该国的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随着最近的危

机，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社会不稳定、贫穷与普遍工资停滞的现象持续存在（2018年的平均工资停留在为2008年的水准）。随着中产阶级与大部分劳动力的期望下降，葡萄牙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失业、沉默的怨恨。从议会选举的弃票率的上升能够看出这一点，从1976年的8.3%上升到2019年的51.4%。不安全感、脆弱性与恐惧导致对社会权力与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崇敬知情，成为滋养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基础。

> 民粹主义的威胁

因此，葡萄牙的民主生活不能倖免于民粹主义的论述。媒体对政治报导、危言耸听的小报新闻以及电视人物广受欢迎（部份是因为他们在娱乐或足球讨论节目中系统性的播映），已经为一些政治人物带来好处。总统德索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他在电视上有每周一集的专属节目，并在全国各地广受欢迎。当今，极右派民粹主义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André Ventura正是从霸权政治光谱的核心中展露头角（社会民主党的前成员，隶属于欧洲议会的自由党the Liberals）。当他成为里斯本郊区市议会的候选人时，他主张以警察暴力打压罗姆人社区，甚至答应对罗姆人妇女施行绝育手术，并声称该社区本质上就是暴力份子，以从事非法活动维生，并受益于社会政策并耗费公共资源、由全民买单，因而获得高知名度。随后，他离开PSD，在上次选举中，他成立一个名为「Chega」的新政党角逐议会选举。他随后以1.3%的得票率成为代表该党参选者中唯一当选的议员。Ventura的政党同时也争取被视为与暴力新法西斯阵营或怀念萨拉查统治的势力有所往来的老派政治幕僚与言论领袖的支持。

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与反移民的论述有越发激化的现象，剑指国家的激进、道德式言辞一再打击议会的民主原则及尊严。「Chega」以游击方式大打口水战，并采取对政治菁英持续迫害的姿态，除了因为出现在议会而增加媒体的报导，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6%民众有意投给该党（Expresso / SIC民调，2020年2月14日）。这正是值得担心的迹象，我们不该再将葡萄牙政坛视为新法西斯政党崛起的例外。■

来信请寄至：
Elísio Estanque <elisio.estanque@gmail.com>